

## 清代之三禮學復興暨清初禮學名家

張麗珠<sup>\*</sup>

### 摘要

清代是經學復盛的時代，禮學尤其蓬勃，學者並往往以元明的經學積衰做為對比；但就禮學之發展而言，實則明儒並非不言禮，明儒所重在於冠、婚、喪、祭等「家禮」，故與立足在三禮學而強調「經禮」的清儒禮學重心不同。因此本文自凸顯清學典範出發，從學術史上清儒之強調經學、要求覈實經典切入，以出生於十七世紀的毛奇齡、萬斯大、萬斯同、李光坡、方苞、江永等學者做為主要觀察對象，期能通過實際爬梳清初諸儒的經禮研究，梳理出清初的禮學發展脈絡，並以清初的禮學興盛，做為清代經學復盛的一個學術史切面觀察。所以本文頗異於歷來學者之於清代個別禮家研究，本文主要著眼於線索式的清初禮學發展，並考察後來乾嘉考據學高峰發展下、以《四庫提要》為代表的官方禮學意識，冀自其於所著錄的清初禮書說明及述評中，得到清初至清中葉禮學思想的演變線索。

**關鍵詞：**三禮學 《欽定三禮義疏》 《四庫全書總目》 萬斯大 方苞

---

<sup>\*</sup>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三禮之名起於東漢末，鄭玄注《周禮》、《儀禮》、《禮記》，始合稱為三禮，因此皮錫瑞稱「鄭注三禮，有功於聖經甚大！」<sup>1</sup> 關於三禮學的考辨，《周禮》是最聚訟紛紜的——《周禮》本名《周官》，書共六篇：〈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司空〉第六，但〈冬官〉亡佚，另以〈考工記〉補之。《周禮》之名，始於成帝時劉歆欲立古文學官而與太常博士辯難，故賈公彥序《周禮注疏》曰「《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至於獲立學官，則始於王莽時劉歆為國師，立《周官經》為《周禮》，置博士。《周禮》是古文經最重要的典籍，但歷來爭議性也最大，是以《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四庫提要》）之「禮類」開篇曰：

古稱議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不能聚訟；《禮記》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庸聚訟；所辯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sup>2</sup>

可見《周禮》之啓辯由來久矣！凡有關《周禮》之書名、來源、作者、內容等，儒者皆有所辨難之。

關於《周禮》之稱，《四庫提要》言《漢志》有言《周官經》六篇，且「杜子春、鄭興、鄭眾、賈逵、衛宏、張衡所注皆稱《周官》；馬融、鄭玄所注猶稱《周官禮》；迨唐賈公彥作疏，始沿用省文稱為《周禮》。」<sup>3</sup> 皮錫瑞《經學通論》則論漢初名《周官》，始見於《史記·封禪書》，而「荀悅《漢紀》曰『劉歆奏請《周官》六篇列之於經，為《周禮》。』陸德明序錄曰『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故他說「《周官》改稱《周禮》，蓋即始於劉歆。」<sup>4</sup> 乾隆間修成的《欽定周官義疏》，也將《周禮》復其本名地稱為《周官》，不過二稱仍皆通用。至於《周禮》之來源，則有謂與《逸書》、《逸禮》同時得之於孔壁而為孔安國所獻者，亦有謂得之武帝時河間獻王等說。至於作者，則有持論周公所作，乃「周公致太平之迹」者，如劉歆、鄭玄、孫詒讓《周禮正義》；有持論戰國時作，如林孝存曰「末世亂瀆不驗之書」、何休言「六國陰謀之書」者；<sup>5</sup> 逮及清儒，則毛奇齡《經問》認同「《周禮》一書出自戰國，斷斷非周公所作」，唯他同時持論「其為周制則尚居十七」，是以他心存護衛而反對「餽羊盡亡」，皮錫瑞亟認同此說，亦曰「三禮皆周時之禮，不必聚訟，當觀其通。」<sup>6</sup> 另外則也有認為係劉歆所偽者，自宋儒已多持論；清儒方苞則著《周官辨》反對偽作之說，但他對於書中之不合古禮者，則歸為劉歆所竄造；姚際恆《周禮通論》、康有為

<sup>1</sup> 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7。

<sup>2</sup> 《四庫全書總目·禮類一》，頁398。

<sup>3</sup> 《欽定周官義疏》提要，頁412。

<sup>4</sup> 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47-49。

<sup>5</sup> 詳賈公彥：《周禮注疏·序周禮廢興》（《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頁9。

<sup>6</sup> 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46。

《新學偽經考》等，則並皆持論偽作說。再說到《周禮》之內容，亦有文王治岐之制、成周理財之書、六國陰謀之書，以及漢儒劉歆竄造以助莽等，莫衷一是。

至於《儀禮》，其單稱《禮》，或稱《禮經》、《士禮》，西漢所稱《禮經》，即今文經所主張的今本《儀禮》十七篇，由魯高堂生傳授，其後分大戴、小戴、慶氏三家，大小戴禮皆立於學官，慶氏則立與未立說法不一；清初毛奇齡《經問》曾經辨正「漢立十四博士，禮大、小戴」，此所謂二戴博士乃指《儀禮》、非指《禮記》也，以此辨正後世說者之誤。不過自從《逸禮》三十九篇出，《禮》十七篇遂有不全之疑；自三禮之名出，十七篇復有非經之疑；加上《漢志》又言「《禮》古經者，五十六卷」、「《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益啓今、古文之爭——古文家以爲《儀禮》十七篇不全，今文家則以爲足本矣。故今文立場的邵懿辰《禮經通論》持論「《禮》十七篇當從大戴之次，本無闕佚。」以爲鄭玄所注十七篇即是完書，《逸禮》和《逸書》並皆劉歆所偽；他並認爲《儀禮》是孔子所定，曰「夫『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儀禮》所謂經禮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時即禮文廢闕，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漢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爲定禮樂者，獨取此十七篇以爲教。」<sup>7</sup> 皮錫瑞《經學通論》認同此說，亦謂「《禮》十七篇，原於周公，定於孔子。周公、孔子時但名《禮》，漢以立學，名爲《禮經》。」並謂「邵氏此說，犁然有當於人心。以十七篇爲孔子所定，足正後世疑《儀禮》爲闕略不全之誤；以《儀禮》爲經禮，足正後世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之誤。」因此稱許道「真乃二千年儒先未發之覈！」<sup>8</sup> 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認同此論，並以《儀禮》載禮頗與《春秋》、《左傳》有同之者加以佐證。至於後來《儀禮》見黜，乃始於宋王安石推行新法，另以《三經新義》試士，而以《周官新義》黜《儀禮》，自後《儀禮》遂爲士子罕習而幾成絕學；因此清儒復興《儀禮》之路，備極艱辛漫長。又，明儒郝敬《儀禮節解》雖然嘗辨《儀禮》是「儀」而非「經」，清儒姚際恆《儀禮通論》也認爲「古禮不傳，亦無專經」，皆反對朱熹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故另主《儀禮》是「輔禮之書」、並非「經」也，但他們也都沒有抹殺《儀禮》的價值；逮及乾嘉，則諸儒多已據信《儀禮》是「經」了，譬如盧文弨、錢大昕、凌廷堪、阮元、胡培翬等。

唯《儀禮》一書全爲儀文度數，苟不能自委曲繁重之節文威儀中得其禮意，真有不知爲何治禮之感，是以清儒之治《儀禮》者，多持「即器明道」理念，欲自儀節中推求禮意，進求禮儀之深層結構，即聖人所據以制禮的「義」之所在。此也即《左傳》子太叔之回答趙簡子，曰「揖讓周旋」是「儀」、非「禮」也，亦林放問「禮之本？」以及孔子之言「人而不仁，如禮何」之命意所在。是以禮儀只是用以「徵聖德之至」者，禮意才是治禮之目的所在，清儒之治禮就是爲了落實實踐儒家「以禮經世」的禮治理想。因此清代《儀禮》學極能凸顯清人強調形下氣化的重「器」思想特質，譬如凌廷堪的禮學思想，便主張由考禮→習禮，所

<sup>7</sup> 邵懿辰：《禮經通論·論禮十七篇當從大戴之次本無闕佚》（收入《皇清經解續編》冊18，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頁1。

<sup>8</sup> 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27、15。

撰《禮經釋例》之「考禮」就是爲了「習禮」，爲使「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sup>9</sup> 所以皮錫瑞也稱「禮所以復性節情，經十七篇於人心世道大有關繫。」<sup>10</sup> 因此清代之《儀禮》學復興，正是清學強調經驗視域、要求經驗落實而發揚客觀實踐精神之一隅表現。

而《禮記》者，乃由孔子弟子共記所聞，後儒復加以損益者也，據魏張揖上〈廣雅表〉，以爲是秦博士、魯人叔孫通所撰輯，清儒陳壽祺主之。《禮記》一書並沒有真偽問題，但有戴德傳記八十五篇之「大戴禮」和戴聖傳記四十九篇之「小戴禮」二書行世，小戴禮即爲鄭玄所注，今本《禮記》是也。陸德明《經典釋文》謂是書「〈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制；鄭玄云〈月令〉是呂不韋所撰；盧植云〈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爲。」清儒則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也說《六經》而外，皆七十子後學所記，故《禮記》「如後世之爲類書然。」<sup>11</sup> 今按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孫卿子》三十三篇、賈誼五十八篇。《禮記》中如〈中庸〉采之《子思》，〈曾子問〉及〈立事〉十篇采之《曾子》，〈坊記〉、〈表記〉、〈緇衣〉采之《公孫尼子》，〈三年問〉采之《荀子》，〈保傳〉、〈禮察〉采之賈誼，則《禮記》純采之七十子後學可知。」毛奇齡《經問》也說「此書爲戰國人書，而其禮則多是周禮。」朱熹認爲《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故朱子加以分別經、傳，有《儀禮經傳通解》之作也。至於清代《禮記》學發展，則盛況不如《周禮》、《儀禮》，雖也有杭世駿《禮記集說》、朱彬《禮記訓纂》，然須逮及今文學崛興始獲得較多關注，譬如康有爲《禮運注》和皮錫瑞《王制箋》等，皆有所闡發之。

## 二、清初禮學復盛的學術背景

入清，清儒的學術興趣很快地定調在經學上；爲什麼學術興趣轉移到經學？有諸多複雜因素，但爲了解決學術蹈空的空疏學風，則是清儒中心意識——由於理學的形上學模式及其形而上進路遠於百姓日用倫常，學術成爲少數上層文士專利品，而「存理滅欲」的絕高道德標準對士人而言，同樣亦是難以臻至，故流爲李贄所批評的「假道學」——「名爲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以及清初顏元所批判的「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sup>11</sup> 晚明雖另有泰州學派王艮等人之選擇移風易俗淑世途徑，以隨機指點農工商賈的大眾化講學方式，「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啓發愚蒙」，期在「布衣倡道」的講學宗旨中實現「日用即道」的化民理想；唯在實現庶民文化之同時，其末流又不免流入「情識而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流弊。故紀昀等《四庫提要》批判明學「諸儒註疏皆度閣不觀，《三傳》、

<sup>9</sup> 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復禮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31。

<sup>10</sup> 《經學通論·三禮》，頁11。

<sup>11</sup> 李贄：《焚書·又與焦弱侯》（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4年），卷2，頁49；顏元：《四存編·學辨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90。

《三禮》尤幾成絕學。」<sup>12</sup> 因此清儒面對晚明以來或鑿空不學、或不切實際的學術蹈空危機，改弦易轍地從外王經世理想出發、從理學內向修身的心性之學跨出，並立足在儒家經典上要求「經典、經世」一體，期藉由「通經→明道→致用」之途徑以實現經世理想。是以由明入清，清學的一個大轉向，便是對明學鑿空不滿、而重回經書。以此，清儒多從事於落實經典的文字辨證和引經據典，而清初由朱、王義理之爭和經典辨偽掀開序幕的經學考證，<sup>13</sup> 也就廣泛地被運用成為清代學術的主流形式。

那麼在經學復盛的學術氛圍中，禮學又是怎樣脫穎而出、且形成一代禮學復興之「復禮」思潮的呢？此又由於一個時代的禮制與社會禮教，可以做為觀察德盛政修的指標，清代緊接著元明經學長期積衰之後，清儒亟思「以禮經世」地藉由禮學來整頓社會風氣；而推行禮教在相當程度上必須倚重禮書，因此「考禮」是為提供百姓實踐典範，以為日用倫常之「習禮」憑藉，再加上禮學內部所存在的議禮之爭，也和引經據典、要求經典實證的清儒好尚同趨，因此清儒繼明世宗「大禮議」之議禮事件後，不但衍生諸多對「大禮議」的後續討論，有關三禮之學的議禮、考禮等禮學考證問題也漸次浮上檯面。

緣自明孝宗子武宗亡，無子嗣、又無兄弟，皇位虛懸近四十日。朱厚熜（即世宗）依《皇明祖訓》「兄終弟及」原則而以興獻王（憲宗子、孝宗同母弟）長子、武宗從弟身分繼統，但在閣臣楊廷和援司馬光、程頤之「濮議」，<sup>14</sup> 要求厚熜必須以孝宗嗣子身分先繼嗣、後繼統下，他則堅持不願繼嗣於孝宗；另外張璁為迎合上意而主張「嗣、統二分」，並據《儀禮》「長子不得為人後」為說，故厚熜終得尊本生父為「興獻帝」；其後又在議定尊號時去其「本生」字樣、逕稱為「皇考」，對孝宗則稱「皇伯考」。不過為了平息此時發生的二百餘位朝臣伏闕爭禮於「左順門」，他遂採取高壓逮捕之流放、戍邊、奪俸、杖刑等手段，朝臣被杖死者達17人。最後並在嚴嵩的支持下，世宗得以「嗣、統合一」地奉興獻帝入祀太廟、追尊為睿宗皇帝，故「大禮議」的最後結果是嘉靖帝在「孝宗→武宗」的帝統之外，另立「睿宗→世宗」新帝統，使繼統演成篡統，還頒著《明倫大典》以昭孝義。不過雖然在明代紛亂近二十年的「大禮議」中，結合皇權而強調「親親」之義的張璁普遍被認為非義，輿論多傾向持「濮議」而仗義死節的儒家道統捍衛者；然而「緣情制禮」的儒家禮教，是否確如「禮學理學化」所強調的必須突出君臣大義而以公義絕私恩？統、嗣究竟孰重？尊君的「尊尊」之義是否凌駕尊父的「親親」之義？要求君臣綱紀的「君統」忠義是否高於父子親情的「親統」仁孝？雖然明臣持「濮議」者氣節甚可貴，但其禮意有無錯謬？這些問題都不免受到了清儒

<sup>12</sup> 《四庫全書總目·周易大全》（藝文印書館），頁124。

<sup>13</sup> 論參余英時言羅欽順論學之主張「取證於經書」，就是清學「以義理的是非取決於經典」的趨向考證契機。詳氏著《歷史與思想·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社，1985），頁101。

<sup>14</sup> 以楊廷和為首的閣臣主張嘉靖應入嗣孝宗，一如西漢成帝立定陶恭王之子、宋仁宗立濮王之子，在封建宗法制度之大宗制度下，漢哀帝、宋英宗皆以宗統繼承帝統，先繼嗣然後繼統——宋代大禮議時司馬光、程頤持此一強調政治關係而貶抑血緣關係的「濮議」主張；唯清儒毛奇齡據《漢書》力言史實並非如此，他說哀帝即位後，仍「父」定陶恭王，並無改稱「叔父」事，也沒有為定陶恭王別立嗣子，仍自居為定陶王之後（論詳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1年），頁246。

質疑，清儒並由此展開對於儒家禮秩之全面重省。現代學者張壽安曾以此議題出發而撰為《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並指出清儒對皇位過繼考證的現實意義，更在於影響了雍正廢嗣以及同治、光緒、宣統之皇位二度過繼等問題，考證與經世脈動極其密切。

是故在清代經學之路和考據方法都已經被打開的情形下，謹於「考禮」而詳究名物度數的三禮之學，以其符合清儒「以禮經世」之經世理想和經典興趣雙重因素，而受到了清儒的高度青睞，並且由此形成清學在學術史上結合「考禮」與「習禮」的禮學發展特徵。不過清初的禮學成就主要在突出三禮學的考辨、即「考禮」上；至於結合「習禮」強調的禮學思想及理論建設，猶有待於乾嘉時期以「一代禮宗」名的揚州學者凌廷堪之發揚。因此清初禮學復盛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重回儒學之「經禮」傳統上——學界向謂明代經學積衰，如張廷玉《明史》、顧炎武《日知錄》、皮錫瑞《經學歷史》等；然劉師培、章太炎則持反對意見地認為清學有賴於明學植基。日人小島毅並舉明代禮學為例，指出明儒以「四禮」實踐之冠婚喪祭等「家禮」為中心、而被《四庫全書》列為「雜禮書」的系列禮書，才是明代禮學核心，「明代禮學，至少有關禮經的注釋書，其數量足以誇示明代比得上宋代之禮學。」因此「明代並非沒有禮學、或者並非蕭條；只不過是沒有清朝考證學定義下的《儀禮》之學罷了。」<sup>15</sup> 張壽安亦指出，禮學從明代的「家禮」強調轉向到清代的「經禮」強調，可說是「明清禮學轉型」，「清儒的禮學考證已從移風易俗之四禮轉向國朝典制之大禮」，借用毛奇齡的話說，就是清學標示「禮有定制，不容輕議」之「以古禮正今俗。」<sup>16</sup> 因此高宗一方面為解決滿、漢禮儀衝突以及儒教禮俗雜入佛、道儀式等問題，另一方面亦鑒於其祖已修有四經義疏、獨三禮未就，故於乾隆元年（1736）即位之初即諭開「三禮館」，命儒臣纂修《三禮義疏》。高宗此舉具有學術史與文化史之雙重意義，因清廷重修禮書、重訂禮典，當然會觸及很多有關議禮、制度與考文之禮學考辨問題；另外清廷也要求冠、婚、喪、祭各種禮制與儀節之制定，都要能被具體施行以化民成俗，是以凡所修定儀制度數等都要酌古準今，以使繁簡合度而切於民用。這一來當然更直接地推動了三禮之學的考辨風氣。

接著轉換視野到清廷欲藉「崇儒重道」以實現其「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的指導思想，<sup>17</sup> 即在清廷以文化正統性維護治權正當性之「政教合一」下的官方禮學意識——清廷的文化政策，從戎馬倥傯的順治帝確定「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之「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以來，<sup>18</sup> 到康熙舉「博學鴻詞」科、再到乾隆開「經學特科」，正可以一窺清代前期官方意識形態及學術走向變遷<sup>19</sup>——自康熙到乾隆中葉前，清廷都極力提倡理

<sup>15</sup> 上詳《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導言·明代禮學研究的特點》，頁1、396-402。

<sup>16</sup> 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頁31、48、34。

<sup>17</sup> 《康熙帝御製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66年），第一集，卷19，頁7。

<sup>18</sup> 《清世祖實錄》，順治12年三月壬子條，卷90，頁712。

<sup>19</sup> 論參林存陽，《清初三禮學·清廷決策與三禮學》，頁289-302。林存陽並指出：康熙17年舉「博學鴻詞」科，雖然大儒如顧炎武、黃宗羲、李顥等皆堅辭不出；但所舉而授以《明史》編修的朱彝尊、汪琬、潘耒、施閏章、湯斌、毛奇齡等則確然相應於博學鴻儒之稱。高宗時雖亦曾舉「博學鴻詞」科，但虛應故事而已，意義不大；倒是乾隆15年所開「經學特科」，顯然具有呈現清初學術風趨之意義。

學；康熙雖也重視經學、也曾重修諸經，如御纂《易經解義》、《書經解義》等，但大抵未脫胡廣《五經大全》底色，康熙一朝所表現的學術好尚主要是提倡理學、崇獎朱學，呈現一派尊朱氣象。康熙嘗言「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sup>20</sup>「朱子註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經今五百餘年，學者無敢疵議。朕以爲孔孟之後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爲弘鉅。」<sup>21</sup>高宗也說「朕自幼讀書，研究義理，至今《朱子全書》未嘗釋手。」並於乾隆5年親頒長篇諭旨，倡讀宋儒之書、研精理學，並曰「不可以僞託者獲罪於名教，遂置理學於不事。」<sup>21</sup>不過在乾隆之致力於提倡理學中，頗要留意的，是他同時欲藉訂禮以扶植綱常名教，使治統、道統同體一貫，因此甫即位即開三禮館，《三禮義疏》和《大清通典》並皆次第完成，故此一官方意識不但與學界倡禮之風同趨，更爲三禮之學提供了更有利的發展空間。

根據學者陳祖武指出，乾隆21年後的經筵講學已經透露出高宗對朱子學的態度轉變，高宗一改早年的推闡朱學，多次對於《中庸章句》、《朱子語類》提出異議，對朱子說法也屢加辯駁，據統計終其朝達17次之多。<sup>22</sup>故清廷學術好尚，自康熙敕纂《朱子全書》、《性理精義》以來以迄於高宗，雖高宗亦獎掖理學，但理學始終不振，而且他素惡理學諸臣之「假道學」，嘗責言：「惟是講學之人，有誠有僞；誠者不可多得，而僞者託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啓標榜門戶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惡。」<sup>23</sup>另外在同一時間內，則江南稽古窮經之研經風氣日益寢盛，於是高宗於乾隆15年開「經學特科」以薦舉經術之士——惠棟之辭薦亦言「國家兩舉制科，猶是詞章之選，近乃專及經術，此漢魏六朝、唐宋以來所未行之曠典。」<sup>24</sup>嗣後，高宗又於乾隆38年開「四庫館」，此一由朱筠所倡開、由紀昀主持的「四庫館」，更儼然漢學家大本營，紀昀本身尤爲「乾嘉時代反程、朱的第一員猛將。」<sup>25</sup>是故清廷是從一開始極力「尊朱」之理學興趣逐漸轉移到經術好尚的，其由宋學→漢學之迹頗爲釐然可尋；而且此一變趨乃是由下而上，先由民間與學界「以經學濟理學之窮」之蔚然成風以後，再影響及於廟堂之上，使朝廷官學逐漸調整其文化政策爲趨向經學的。是以從「博學鴻詞」到「經學特科」，濃縮呈現了清初學術風氣之變遷。

### 三、立足於經禮傳統的清初禮學名家

三禮紛紜已如前述，入清，又在清儒突出經學傳統且對禮學具有濃厚興趣下，立足於三禮以研禮的學者前後接踵，故以下即以生於十七世紀的清初禮學名家：張爾岐、毛奇齡、萬

<sup>20</sup> 《康熙帝御製文集》第四集（臺北：學生書局，1966年），卷21，頁12；《清聖祖實錄》，康熙51年正月丁巳條，卷249，頁466。

<sup>21</sup> 《清高宗實錄》乾隆6年七月癸亥條、乾隆5年十月己酉條，卷146、128，頁1095、876。

<sup>22</sup> 陳祖武，〈從經筵講論看乾隆時期的朱子學〉，「朱子與東亞文明」研討會，頁11-21。

<sup>23</sup> 《清高宗實錄》乾隆5年十月己酉條，卷128，頁876。

<sup>24</sup> 《松崖文鈔·上制軍尹元長先生書》，《東吳三惠詩文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6年），頁314。

<sup>25</sup>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年），頁106。

斯大、萬斯同、李光坡、方苞、江永等人之禮學旨趣及其思想大要，做為勾勒清初禮學發展的脈絡軸心：

### （一）張爾岐（1612-1678）、毛奇齡（1623-1716）

張爾岐所著《儀禮鄭注句讀》，開有清一代漢學治經以及治《儀禮》學先聲，距惠棟（1697-1758）後來樹立清代「漢學」典範、標榜專門漢學的治經路徑，猶近百年之久。當明清更迭世亂之際，禮學名家張爾岐，不應科名，杜門著述，而能有此慧識，頗值得一書。

《儀禮鄭注句讀》本於鄭玄注，但並未拘泥之；爾岐實兼取監本、唐開成石經本、元吳澄本、陸德明音義以及朱子、黃榦所次經傳通解諸家，與相讎校之，凡所誤謬、脫落、衍羨、顛倒或經注混淆者，皆詳加考校而得其實。至於書名「句讀」者，《提要》有言「是書全錄《儀禮》鄭康成注、摘取賈公彥疏，而略以己意斷之，因其文古奧難通，故並為之句讀。」復加案語，舉《禮記》「一年視離經辨志」及注曰「離經：斷句，絕也」，以《禮記》言入學一年先教斷句為說，故曰「『句讀』為講經之先務。」《提要》並稱其書「於字句同異，考證尤詳」，可見爾岐對於考證之重視及學風之先導。是以《儀禮鄭注句讀》極重要的學術作用，便在於繼宋明理學長期以理解經之後，回歸到漢說傳統之鄭注上，故以顧炎武之少有許人者，獨於張爾岐極推重之，曰「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頗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甚至還稱以己不如之，可謂推挹之甚也，而《提要》亦曰「爾岐茲編，於學者可謂有功矣！」<sup>26</sup> 附論於此。

毛奇齡，博洽群書而說經善考證，其學縱橫博辨，睥睨一世，《提要》稱以「著述之富，甲於近代。」<sup>27</sup> 他於易學著有《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河圖洛書原舛編》、《太極圖說遺議》；於春秋學著有《春秋毛氏傳》、《春秋簡書刊誤》、《春秋屬辭比事記》；於禮學著有《辨定嘉靖大禮議》、《郊社禘祫問》、《辨定祭禮通俗譜》、《喪禮吾說》、《曾子問講錄》、《昏禮辨正》、《廟制折衷》、《大小宗通釋》、《學校問》、《明堂問》；於詩經學著有《毛詩寫官記》、《詩札》、《詩傳詩說駁義》、《續詩傳鳥名》；於尚書學著有《古文尚書冤詞》、《尚書廣聽錄》、《舜典補亡》；於四書學著有《論語稽求篇》、《四書賸言》、《大學證文》、《大學知本圖說》、《大學問》、《四書改錯》，其門人弟子復為編次《四書索解》、《逸講箋》、《中庸說》等等，餘作尚多，不一一列舉，要之，清儒著述之富，罕有出其左右者。《四庫提要》說奇齡「說經善考證，而喜辨論，故詮釋義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駁詰。」並稱美他「就經說經，不相繳繞，尤為特識矣！」對於開闢學風，亦肯定「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奇齡開其先路。」<sup>28</sup> 不過相對於毛奇齡之學術高度評價的，卻是時人對其為人之貶辭，全祖望曾撰〈蕭山毛檢討別傳〉詆其不德；《四庫提要》也屢在稱美其學「義例皆

<sup>26</sup> 《儀禮鄭注句讀》提要，頁428-429。

<sup>27</sup> 《西河文集》提要，頁3503。

<sup>28</sup> 《四書賸言》提要、《春秋屬辭比事記》提要、《易小帖》提要，頁753、600、145。



有徵據，而典禮尤所該洽」之外，對其人卻罕有好詞，甚至在評論其為人與風格時，曰「至於喧呼叫呶，則其結習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議不論可矣。」<sup>29</sup> 大有心死之況味。

毛奇齡於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儒徵，授翰林院檢討，與修《明史》，負責撰寫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兩朝紀傳，故在史纂之外，他對明代「大禮議」一事亦極為措意，並恐後人據《明倫大典》興獻王稱宗入廟事以爲變亂之本，因此撰爲《辨定嘉靖大禮議》以專論其事。奇齡純就禮制層面言，他引經據典地駁斥程頤、楊廷和等人「濮議」之論，是爲「不讀書，誤人國事。」責以不識《春秋》、《三禮》之義，「典禮見在六經」，卻徒爲臆說——明代大禮議最重要的爭論焦點，在於楊廷和、桂萼等堅持「繼統必先繼嗣」、「爲人後者爲之子」，主張世宗必須以孝宗爲父、本生父興獻王爲叔，在「皇位過繼」下必須以孝宗嗣子的身分踐位；然而世宗質疑「父可改乎？」不從其說，否則寧「避位歸藩」，楊廷和等退讓。不過在世宗得遂心意、後來楊廷和亦致仕以後，「大禮議」卻愈演愈烈，並發展成爲朝臣伏跪爭禮以及世宗血腥鎮壓；最後遂在嚴嵩之支持下，世宗爲所欲爲地追尊獻帝爲睿宗皇帝，使未爲天子的睿宗得以享祀太廟，事件的最後結果以另立新統的方式篡統——明代「大禮議」經政治發酵後，早已非復單純的議禮事件，而是涉及朝廷派系傾軋奪權之政治事件；不過清儒乃以純粹的經學考證興趣出發，強調回歸經典，從學術層面的「治禮」角度來加以考禮、議禮，從而提出客觀的論禮之見。

毛奇齡論傳位法，主要在於析論「世統」與「廟統」之分<sup>30</sup>——「世統者，生倫之序也；廟統者，即人君歷數相授之次第也。」他主張「繼爵不繼人」，謂「世宗當後武宗，不後孝宗」，<sup>31</sup> 當以廟統之昭穆爲序，而無變於血緣生倫之本生世系。其〈又奉史館總裁劄子〉亦曰「其書昭穆者限之以廟次之稱夫高、曾、祖、禰。……假使以尊長而繼卑幼耶，則卑亦從尊，魯閔公之爲祖是也。魯閔以弟先立，而僖兄繼之，則閔弟爲祖、僖兄爲禰。若必先兄而後弟，則在《左傳》謂之逆，而在《公羊》別傳直謂之叛，以先禰而後祖也。」<sup>32</sup> 是故「繼統」與「尊親」依禮可以並存。他並以《漢書》爲證，具論始創於司馬光、程頤的「濮議」，其凸顯「尊尊」之義而以「天理」說君臣大義，並要求入繼主必須斷絕私親，實則不僅不合史實且古禮無此說；而楊廷和等所據「濮議」之謂「舜不追尊瞽瞍，漢光武不追尊南頓君」，證諸史實亦非如此——史載之歷歷可考者，如光武立廟「以元、成、哀、平四帝作高曾祖禰四廟；但對本生之親統，自生父南頓君以上之四祖輩，亦皆立廟、稱皇、稱考」，何嘗如宋儒所論對於本生世系不立廟、不稱皇、不稱考？所以毛氏說他們對漢魏史書並不一寓目焉。

故凡程頤、楊廷和所謂入繼主對於所從出父母應另加以「本生」字、且不得以「皇考」稱之，毛奇齡謂皆不合於禮且無據，他認爲「祖孝宗、禰武宗，追尊興獻王爲皇考、立廟京

<sup>29</sup> 《春秋毛氏傳》提要，頁 598。

<sup>30</sup> 論參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1 年），頁 244-251。

<sup>31</sup> 毛奇齡：《辨定嘉靖大禮議》（《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卷 1，頁 5。

<sup>32</sup> 毛奇齡：《西河集·又奉史館總裁劄子》（《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冊 1320），頁 92。

師，則公私俱安。」<sup>33</sup> 是故宋明儒強調獨尊君統而斷絕本生的禮論，遭到了清儒強烈批判，並認為明儒因誤信「濮議」之論，蔑視與獻妃與厚嫡的寡母獨子之情，導致杖朴貶謫、血流廷殿，反陷世宗於不義；但是明世宗尊親太過，奉興獻入太廟之過激行為，使得「繼統」演成「篡統」之中絕帝統，亦同樣受到批判，故《明史》曰「生祔太廟，而躋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自後清儒之論禮者絡繹於途，據張壽安拈出清儒對於皇位過繼的後續重要討論，猶有任啓運強調「統不奪親、親不奪統」之「繼統」與「父子之名」為二事；朱筠之指出歷史上有「間代立後」事實；段玉裁〈明世宗非禮論〉十篇也說《春秋》之以兄後弟、以孫後祖、以叔後姪者，所在多有，故「為人後」實際上是一種「立後禮」的禮身分；另外晚清王棻《大禮平議》等也「統、嗣二分」地將君統、本宗判然二途；郭嵩燾復於《禮記質疑》提出「君臣倫非父子倫」，主張君臣、父子二倫之分立。<sup>34</sup> 故清儒普遍反對宋儒要求父子改稱之無據，以此鬆動了宋儒之於《公羊傳》「為人後者為之子」的迷思，也使得禮制獲得進一步之澄清。

不過儘管毛奇齡自認深於禮學，三禮學的著作極其繁多，四庫館臣亦承認他善禮學，「典禮尤所該洽」，但《四庫全書》禮學之部只著錄他《郊社禘祫問》和《辨定祭禮通俗譜》二書，其餘眾作則皆存目而已；反倒是奇齡另一編次未竟、尚非完書的《春秋屬辭比事記》，其所以被著錄的原因，卻在「奇齡長於辨禮；《春秋》據禮立制，而是書據禮以斷《春秋》，宜其秩然有紀也，……尤為特識矣。」<sup>35</sup> 故此頗堪玩味。因此以下即以《提要》述評做為線索，以考察清廷的官方意識型態以及《四庫全書》對毛奇齡眾作的取捨判準。

有關毛奇齡的禮學著作，《四庫》雖然收錄了其《郊社禘祫問》之作，但仍附帶批評「奇齡性喜攻駁，反覆詰辨，未免繁雜。」<sup>36</sup> 是對其學術風格顯然有不愜於心者。而對於另一部同樣獲得著錄，其內容主要是涵蓋祭所、所祭者、主祭之人、祭之時、祭儀、祭器、祭物等而言的《辨定祭禮通俗譜》，則《提要》在說明其得為《四庫》收錄的原因在於能取古禮而酌以今制以外，復因其內容間有與朱子《家禮》為難者，而費詞地多方為朱學辯說、開脫，此亦耐人尋味。《提要》曰：

其中各條，雖間與朱子《家禮》為難，不出奇齡平日鬻爭之習。然考《朱子年譜》，《家禮》成於乾道六年，……其藁旋為人竊去，越三十年朱子沒後，始復有傳本行世，儒者或以為疑。黃榦為朱子弟子之冠，亦云為未暇更定之本。則《家禮》之出自朱子手定與否？尚無顯證。即真獲朱子已失之藁，而草創初成，亦恐尚非定本。以王懋竑之篤信朱子，而所作《白田雜著》乃反覆辯是書之依託，其言具有根據。則奇齡之辨，又不能盡以好勝目之矣。<sup>37</sup>

<sup>33</sup> 《辨定嘉靖大禮議》，卷1，頁10-11。

<sup>34</sup> 詳《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頁256-268、332-334。

<sup>35</sup> 《春秋屬辭比事記》提要，頁600。

<sup>36</sup> 《郊社禘祫問》提要，頁464。

<sup>37</sup> 《辨定祭禮通俗譜》提要，頁471。

該提要雖然述評奇齡《辨定祭禮通俗譜》之作，卻多所說明館臣對於奇齡辨駁朱子《家禮》之作，何以仍加錄存的原因。故《提要》一再闡述《家禮》一書未可以盡信確實出自朱子手定，其書有可能係依託偽作者、或朱子所未暇更定之書，因此亦未能盡以好勝來看待奇齡之作——如此婉辭說明《四庫全書》錄存毛奇齡「與朱子《家禮》為難」的《辨定祭禮通俗譜》之緣由，流露了館臣對於著錄與朱子立場不同的奇齡之作的「不安、或非其所好」。

蓋奇齡兼擅義理學與考據學，他在清初頗有辨偽之作，對於清代考據學風、尤其辨偽學之開闢極為有功；然其所持義理立場，則與梨洲同屬色彩鮮明的王學一系，這和清廷崇獎理學的「尊朱」立場顯然相悖。而其所撰著《大學知本圖說》、《太極圖說遺議》、《河圖洛書原舛編》，不但批評朱學援道入儒，也對朝廷採用朱熹增補〈格致補傳〉的改本〈大學〉構成挑戰，並與明末劉戡山《大學古文參疑》、清初陳確《大學辨》等護衛陽明學說之辨偽諸作互相輝映，概屬清初主流外的雜音、異音。毛奇齡如此攸關科舉利害、仕途利祿的學術考辨及對立立場，即撇開館臣對其為人「性喜攻駁」之不滿，其所面對來自各方兩極化的批評，也是不難理解的。是故館臣對於奇齡不涉朱、王門戶之爭者，尚能給予好評，如《春秋毛氏傳》，《提要》即稱其「自吳澄《纂言》以後，說《春秋》者罕有倫比。」同時《提要》又說「非其說《詩》、說《書》，好逞臆見者比」，<sup>38</sup> 更可見奇齡在譬如《詩》、《書》等學上所呈現的、與朱學立場不同之對立意識，才是館臣所不滿於其學的真正原因，故此頗可以提供索解官方意識形態及禮學立場的線索。因此通過考察《四庫提要》對於奇齡易學、禮學、詩經學、尚書學的眾多述評，或可以按圖索驥而得到答案。

奇齡的義理學在清初以王學立場名；然而四庫館臣在「漢學解經」之經學方法論外，於義理學係抱持「尊朱」立場，如朱筠曰「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sup>39</sup> 可以做為代表性思想。因此《四庫全書》所著錄奇齡易學之部的著作，如《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等皆未涉朱王立場者——《提要》亟推崇毛奇齡漢學治經的方法論，如《易小帖》提要稱「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奇齡開其先路。」<sup>40</sup> 便亟稱美奇齡引據古人、使儒者不敢空言說經之開清初考證學風。然而對於一落朱、王門戶者，譬如《河圖洛書原舛編》，則《提要》曰「自生名例，轉起葛藤，左右佩劍，相笑無休，是仍以鬪解鬪，轉益其鬪而已矣」，<sup>41</sup> 故僅得存目。其實關於圖書象數說，在胡渭《易圖明辨》後，朝廷與學界大致均已接受易圖「援道」的辨偽共識了；然而館臣對於清初王學派先導性的開啓易圖辨偽之風，仍存在微詞地加以點名批判，謂「國朝毛奇齡作《圖書原舛編》、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黃宗炎作《圖書辨惑》，爭之尤力，然皆各據所見抵其罅隙。」此中顯然寓有館臣對於王學系辨偽易圖之不滿；反之，對於沒有義理立場的胡渭《易圖明辨》則未有貶辭，且稱其「辨象數流弊者，皆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箝依託者之口。使學者知圖書之說，雖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乃修鍊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

<sup>38</sup> 《春秋毛氏傳》提要，頁 598。

<sup>39</sup>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洪榜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 年），卷 6，頁 6。

<sup>40</sup> 《易小帖》提要，頁 144。

<sup>41</sup> 《河圖洛書原舛編》提要，頁 229。

流，而非作易之根柢，……尤為有功於經學矣。」<sup>42</sup> 再看《提要》之於奇齡僅得存目的《大學知本圖說》述評，亦可以瞭然於館臣和王學系的義理立場之各有其主。《提要》言「毛奇齡撰是書由古本〈大學〉之說，以攻朱子〈格物〉之傳。……蓋奇齡歷詆先儒，而頗尊其鄉學，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誠意』，則劉宗周之『慎獨』也。」<sup>43</sup> 實則清初從館閣理學名臣之於朱學捍衛，到《明史》立傳之貶落陽明，再到《提要》之貶抑陽明所主張古本〈大學〉及其「致良知」之說等，在在皆可見官方意識形態對於王學一系持壓抑的素來不滿態度。

由於清廷的理學立場「尊朱」，故館臣對於王學一系凡與朱學為難者，皆心存不喜；是以《提要》之於奇齡他著述評，一再地批判他之尋釁於朱學，如曰「惟恃其博辨，往往於朱傳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於疎舛。」「可謂虛辭求勝，不顧其安。」「奇齡以竄亂古經詆朱子，而所為又更加甚焉！雖善辨者，殆亦難為之辭矣。」<sup>44</sup> 至於《四庫全書》在充分理由下必須錄存奇齡存在朱、王立場不同的著作時，《提要》也必多方說明其所以著錄的原因，竟似有不得已而著錄者，如曰「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為辭，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並存之。」「奇齡學本淵博，名物訓詁頗有所長，必盡廢之，亦非平允之道。」<sup>45</sup> 而即使已著錄了，還要申明「置其臆斷之說，而取其精核之論」之館臣立場與態度，<sup>46</sup> 如此「殊不好之」的自我表白，除了可見館臣也不得不承認清初王學系的毛奇齡確實有功於經學外，亦顯見「朱、王之爭」在清初延燒未歇之一斑。

而除了思想上顯然的朱、王門戶以外，通過考察《四庫提要》，還可以探討做為漢學大本營的四庫館在特定主題上的意識型態，因此回到毛奇齡的禮學著作，除前述《郊社禘祫問》和《辨定祭禮通俗譜》二書以外，其禮學諸作皆僅得存目，大多未為《四庫全書》所著錄，此中便頗可以提供觀察線索。以下考察奇齡未被《四庫》收錄、僅收入「禮類存目」的《提要》述評：《周禮問》提要首先說明奇齡的《周禮》立場，「辨《周禮》出戰國之末，不出劉歆」，只此一端便已不符清廷立場了——但其實奇齡雖然持論《周禮》非周公所作，他舉證《史記》、《漢書》以證明漢武時已有是書，故謂亦非劉歆所偽；他並跳脫過去學者非褒即貶的態度，自《周禮》保存周制的歷史價值，客觀地予以肯定。唯清廷係自肯定周公作《周禮》的立場出發，因此《提要》明說《四庫》不錄存《周禮問》的原因，就在於奇齡對於《周禮》，「陽雖翼之，陰實攻之矣！」「好為異論，不足據也。」<sup>47</sup> 實則其未能完全符合清廷持論故也。而除了毛奇齡以外，實際上《四庫全書》對於凡辨以戰國人作、或漢儒劉歆所竄亂者，並皆一概不取。

<sup>42</sup> 《易圖明辨》提要，頁149-150。

<sup>43</sup> 《大學知本圖說》提要，頁777。

<sup>44</sup> 《續詩傳鳥名》提要、《尚書廣聽錄》提要、《舜典補亡》提要，頁361、293、321。

<sup>45</sup> 《古文尚書冤詞》提要、《毛詩寫官記》提要，頁292、360。

<sup>46</sup> 《尚書廣聽錄》提要，頁293。

<sup>47</sup> 《周禮問》提要，頁483。

再如《喪禮吾說》提要，曰「奇齡說經好立議論，而顛舛乖謬則莫過於書。……奇齡以《周禮》、《儀禮》同出戰國人偽撰，故於《周禮》司服職齊衰斬衰之文，置之不道。……不特叛經且背律矣，豈非恃其博洽，違心巧辨哉？」<sup>48</sup> 又，附論於《古文尚書冤詞》提要者，亦曰「《儀禮》十七篇古無異議，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載樂史有五可疑之言，後儒亦無信之者；奇齡獨拾其緒論，詆為戰國之偽書。」<sup>49</sup> 於此皆可見清廷堅信聖人作為的禮學立場。餘如《昏禮辨正》提要：「其說頗為辨博，其中論告廟朝至之儀，雖頗有根據而核，其大致穿鑿者多，未足據為定論也。」<sup>50</sup> 《曾子問講錄》提要：「是皆橫生臆見，殊不可從。」<sup>51</sup> 《廟制折衷》提要：「一自奇齡言之揆諸經傳，反多未合，甚矣其彊辨也。」<sup>52</sup> 《學校問》提要：「殊為牽合溷淆也。」<sup>53</sup> 《明堂問》提要：「輕議前儒，未免反成舛漏矣。」<sup>54</sup> 皆可見館臣素不滿奇齡所論，多指為違心巧辨、穿鑿、橫生臆見、彊辨、牽合溷淆、舛漏；然《四庫》於「五經總義」類亦嘗著錄奇齡以隨問隨答方式回答執經問難而纂輯成的《經問》一書，且亟讚美，至謂「以馬鄭之淹通、濟以蘇張之口舌，實足使老師宿儒變色失步，固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sup>55</sup> 可見館臣對於奇齡同時存在著嫌惡與佩服兩種矛盾心態；持平地說，館臣對其學亦極為推崇，有時也亟致隆譽之辭。

總論毛奇齡其人其學，《提要》云「其學淹貫群書而好為駁辨以求勝」，<sup>56</sup> 已足以盡之矣。綜觀《提要》之於奇齡各作述評，可知館臣所不滿於奇齡者主要有二端，即對其人駁辨求勝及其學術立場之不能認同，後者尤其呈現朝廷官學意識形態與奇齡思想間的矛盾衝突立場，故凡奇齡表現出王學色彩而與朱子為仇、或辨偽《周禮》係出戰國之作者，皆因與朝廷「尊朱」以及強調《周禮》係「周公致太平之迹」學術立場不同，而不為館臣所認同、所作亦未獲錄存。《四庫全書》對於清初遍注群經的奇齡眾作，其所著錄者，皆為對於後來形成清學主流形式、引經據典之漢學解經進路具有先導之功，而不涉義理立場者。

## （二）萬斯大（1633-1683）、萬斯同（1638-1702）

萬斯大、萬斯同兄弟，浙江鄞縣（今寧波市）人，他們是明遺民、復社名士萬泰之子，梨洲之弟子。萬斯同精通經、史之學，尤以史學名世，後來銜師命進入「明史館」，以不署銜、不受俸之姿領導編修《明史》；萬斯大亦絕意進取，不事帖括，專精於禮學，著有《學禮質疑》、《禮記偶箋》、《儀禮商》、《周官辨非》等禮學之作，合《學春秋隨筆》為《經學五書》。梨洲嘗親自點定《經學五書》，並為《學禮質疑》撰序，復於斯大之死，親撰〈萬充宗墓誌銘〉，自稱以「姚江老友」，痛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

<sup>48</sup> 《喪禮吾說》提要，頁 491-492。

<sup>49</sup> 《古文尚書冤詞》提要，頁 291。

<sup>50</sup> 《昏禮辨正》提要，頁 522。

<sup>51</sup> 《曾子問講錄》提要，頁 507。

<sup>52</sup> 《廟制折衷》提要，頁 523。

<sup>53</sup> 《學校問》提要，頁 524。

<sup>54</sup> 《明堂問》提要，頁 524。

<sup>55</sup> 《經問》提要，頁 688。

<sup>56</sup> 《古文尚書冤詞》提要，頁 291。

之廢也。此吾於萬充宗之死，能不慟乎！」<sup>57</sup> 其好友鄭梁亦稱譽其禮學，「能推倒一世，親見古人如此。」<sup>58</sup> 焦循代阮元撰〈萬氏經學五書序〉，稱「非數十年冥索之功，未易有此。」<sup>59</sup> 《浙江通志·儒林傳》、《寧波府志·文學傳》並皆稱其「發先儒之所未發者。」<sup>60</sup> 斯大禮學之爲世所重，可見一斑。

三禮之學歷唐宋式微與元明積衰後，幾成絕學；而就清代學術突出於我國學術史之發揚經學傳統與重視經典而言，則在清代經學復盛中尤稱顯學的三禮考辨，萬斯大堪稱其開端緒者。斯大治禮之與宋明儒差異，就在他突出根柢於三禮的「經禮」強調，所撰《周官辨非》開清儒以專書考辨《周禮》的風氣之先，故梁啟超稱清代「禮學蓋萌芽於此時了。」<sup>61</sup> 斯大嘗自述其本於「經禮」的禮學方法論，曰：

首取《戴記》諸篇相對，次取《儀禮》與《戴記》對，次取《易》、《書》、《詩》、《春秋》及《左》、《國》、《公》、《穀》與二《禮》對，見其血脈貫通，帝王制度約略可考用。……禮教弘深，學者務使禮經與諸經傳逐節關通。<sup>62</sup>

斯大治禮本諸經禮，要求「以經釋經」並「會通諸經」，他不但突出經典強調而且實際運用此法以治禮，因此其以諸經互證的經學方法論，實開專門漢學之先河。梨洲亦嘗歸納並讚美其治經法，曰：

（充宗）湛思諸經，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略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反有致疑於經者，……如此者層見疊出，充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冰泮。<sup>63</sup>

斯大強調據經爲斷的「以經釋經」、「會通諸經」等經學主張，其時在清學形成「漢學」典範及訓詁學系統理論建構以前，故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目爲「十八世紀漢學的前驅者。」<sup>64</sup> 由於斯大研經重視經典，亟反對世儒之過信傳注、反致疑經——六朝義疏之學在「疏不破注」傳統下，雖頗與漢學傳統貫通，但其於漢注之有誤者亦曲爲彌縫，反疑經典之誤；因此在清儒要求以經典覈實驗證下，晚出且思想駁雜的義疏之學，其價值觀遂逐漸崩毀，如孔穎

<sup>57</sup> 《南雷文定》（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123。

<sup>58</sup> 鄭梁：〈跛翁傳〉頁4，《經學五書》附。

<sup>59</sup> 焦循：《雕菰集·代阮侍郎撰萬氏經學五書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頁239。

<sup>60</sup> 《經學五書》附，頁8、10。

<sup>61</sup>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8年），頁186。

<sup>62</sup> 萬斯大：《經學五書·學禮質疑自序》（臺北：廣文書局，1977年），頁3-4。

<sup>63</sup> 黃宗義：《南雷文定·萬充宗墓誌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頁123-124。

<sup>64</sup>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五卷，頁408。

達《五經正義》採用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和《周易》採道家言之王、韓注等，便極受到清儒批判。因此萬斯大《經學五書》強調回歸經典的經學主張，在清初亟具先導意義。

在〈學禮質疑自序〉中並可以見斯大研經係以「考用」三代帝王典制為出發，即他之關懷禮儀、禮俗等問題，一皆出於經世理想；故他又曾將曆法、祭法、宗法、喪禮、嘉禮之有疑者，取其大者條而說之，就教於其師——「質之於吾師梨洲先生」，並撰為《學禮質疑》，梨洲為序亦曰「充宗以為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sup>65</sup> 其書亦突出覈實經典的「會通諸經」主張，如斯大問於梨洲曰：

「學禮有疑，求之註疏而不得，求之唐宋以來諸儒而又不得，以經說禮，其可乎？」先生曰「然。」又請於先生曰：「《易》、《詩》、《書》、《春秋》而下，《左》、《國》、《公》、《穀》去古為近，可擇而取也；外此如汲冢《竹書》之類，非古而託之於古，附會多而確據少，置而不道，其可乎？」先生曰「然。」<sup>66</sup>

此外，梨洲文集中有〈答萬充宗質疑書〉、〈答萬充宗鄉射侯制〉等文，亦可以見當時師弟間的禮學問答。梨洲亟稱許萬斯大禮學，嘗曰「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僅當今無與絕塵，即在先儒，亦豈易得！」<sup>67</sup> 斯大於禮學之用心細密，可見一斑。

斯大《學禮質疑》和《儀禮商》二書為《四庫全書》所收錄，另外《周官辨非》和《禮記偶箋》則列為存目。《學禮質疑》所負盛稱者，如斯大嘗針對禮制之「常」與「變」，進行關於世次、昭穆、廟制等問題之思考，並提問：「天子七廟固為定制，然而處常則易明，遇變則難曉。何謂常？父死子繼是也；何謂變？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以叔繼兄之子之類是也。」於是關於處「變」，斯大提出了昭穆說上極具里程碑意義的「兄弟同昭穆」之說。其曰：

蓋嘗思昭穆之為義，生于太廟中祫祭位鄉（自註：太祖東鄉，子孫南北鄉，南向者為昭，北鄉者為穆），而子孫因之以定其世次。故父子異昭穆，而兄弟則昭穆同。……如謂以兄終弟及之故，即如父子之易世，……非父子而以為父子，本兄弟而不以為兄弟，如是而以為禮，是徒知天下之足重、天子之當尊，不知兄弟之倫之不可無也。……聖人於兄弟之際，天下國家在所可輕，而一體無分之至情不因勢位而稍變。如謂以兄終弟及之故，使生為一父之子，沒為異世之親，將上何以接高曾祖考之神靈？下何以協子孫臣庶之稱謂？是昭穆一混，而名之不正、言之不順即隨之。<sup>68</sup>

然而兄弟同昭穆，如兄弟相繼之變例，則廟制當如何？斯大曰「同廟異室。」他並據〈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謂曰「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得指之為後人之臆見也。」所論在毛奇齡於明代「大禮議」上主張區別世次、廟次，「一以人君入廟之先後書為次第」之外，別立其說，而《提要》對於斯大所論稱以「皆極精確」；<sup>69</sup> 反之，

<sup>65</sup> 黃宗義：《南雷文定·學禮質疑序》，頁11。

<sup>66</sup> 萬斯大：〈學禮質疑自序〉，頁3。

<sup>67</sup> 黃宗義：〈答萬充宗質疑書〉，頁49。

<sup>68</sup> 《學禮質疑·兄弟同昭穆》，頁63。

<sup>69</sup> 《學禮質疑》提要，頁463。

在「史部·政書類」存目中則《提要》批評奇齡「實乖典制」，駁斥其「謂世宗既嗣武宗，即當以武宗爲父，引公羊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作證；然奇齡於所著《春秋毛氏傳》及《曾子問講錄》內論仲嬰齊卒一條，則又力闢公羊之誣，謂嬰齊不得以兄子家爲父，父仲遂爲祖，……此說前後矛盾，殆不可解。」<sup>70</sup> 另外秦蕙田《五禮通考》亦稱「萬充宗據兄弟同昭穆之義，定爲同廟異室之制，則世次不紊而廟制有常，不唯補先儒之闕，直可爲萬世之典矣！」斯大之說對於後儒頗有影響。

斯大遷杭以後，又嘗與曾舉博學鴻詞科並撰有《禮學彙編》七十卷、爲《四庫》所存目的應搗謙，往復論辯禮制而撰爲《儀禮商》一書；搗謙爲序《儀禮商》述及兩人當時論辯之激烈，曰「余喜其潭思，嫌其自用，時欲切磋之；而萬子護其所見，未肯動步，往復之際，動盈卷軸。非余兩人不適時宜、癡且癖，莫肯爲此也。」<sup>71</sup>《儀禮商》主於會通《儀禮》、《戴記》，而歸納禮制之通例者也。斯大《學禮質疑》嘗言「禮取相配而義足相成，推類而識其真，亦聖人之所許也。」《儀禮商》論鄉飲酒禮，亦曰「《儀禮》著其儀，《戴記》詳其義，義所以明禮，相爲表裏，二而一者也。其儀禮有未備者，則義文補之，讀者取而並觀，互爲考訂，其中首尾脈絡，本自明通。即或用此禮者，其名不同，要不得謂《儀禮》之禮與《戴記》之義有殊禮也。」<sup>72</sup> 因此他強調「《儀禮》一經與《禮記》相表裏，考儀文則《儀禮》爲備，言義理則《禮記》爲精。……必通達其儀文，而後得明其義理，故讀《禮記》而不知《儀禮》，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也，懸空無據，豈能貫通。」<sup>73</sup> 歷來對於《儀禮》嘗進行通例歸納者，譬如李如圭《儀禮釋宮》、朱熹《儀禮經傳通解》、魏了翁《儀禮要義》等，皆曾運用之，斯大《儀禮商》更歸納其例曰：

大要十七篇中，以冠昏、喪祭、朝聘、射鄉、燕食、相見爲之目；以冕弁、衣裳、帶鞶爲之飾；以幣帛、皮圭、璧琮、車馬爲之物；以鼎俎、豆籩、簠簋、敦鉶爲之器；以升降、拜跪、揖讓爲之文。委曲周詳，至繁至密。……古人之禮行於廟者十七，行於寢者十三，……苟不由行禮之節次，因以熟察其精微，則是得其淺而遺其深，識其末而忘其本，究且與祝史無異。<sup>74</sup>

至其細節，如謂：

古者飲食賓客之禮，曰食、曰饗、曰燕。食主于飯而已，其禮簡；饗則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禮雖盛而情未洽；惟燕所以示慈惠，主於飲酒，恩意懇款，盡醉飽之歡，故其用至廣。<sup>75</sup>

<sup>70</sup> 《辨定嘉靖大禮議》提要，頁1691。

<sup>71</sup> 應搗謙：〈儀禮商序〉，《儀禮商》（收在《經學五書》），頁1。

<sup>72</sup> 《學禮質疑·北郊主月》，頁42；《儀禮商·鄉飲酒禮》，頁15。

<sup>73</sup> 《儀禮商·與陳令升書》，頁99-100。

<sup>74</sup> 同前註，頁100-102。

<sup>75</sup> 《儀禮商·燕禮第六》，頁29。



故學者梁勇稱萬斯大「是有清一代對《儀禮》進行通例歸納的第一人。」<sup>76</sup> 其後江永有《儀禮釋例》，也對禮服進行通例歸納；凌廷堪有《禮經釋例》定禮例爲八——通例、飲食之例、賓客之例、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之例、雜例等，使繁縟的節文威儀成爲簡明之通例，是清儒視歸納通例爲治《儀禮》門徑之集大成者。再者，對此繁複禮制，斯大又以圖解禮，如他繼宋聶崇義《新定三禮圖》、楊復《儀禮圖》之後，另製〈廟寢圖〉以修正補充楊復之《儀禮圖》，並曰「竊依經文，更爲〈廟寢圖〉，門庭、戶牖、堂階、房室，昭昭布列，明乎此，則凡行禮之始終節次，井然秩然，雖其委曲周詳、至繁至密者，無不言下立辨，迎刃而解矣。」<sup>77</sup> 而斯大在《學禮質疑》爲世所稱的〈宗法〉八篇中，也製有大、小宗圖——〈公子宗道三圖〉、〈大宗百世不遷之圖〉、〈小宗五世則遷之圖〉……等，他亦是清儒以圖解禮之第一人，其後清儒有張惠言《儀禮圖》之集大成，故斯大有筭路藍縷之功也。

此外，斯大考辨《周禮》的《周官辨非》名著，亦是立足在「以經說禮」之會通諸經方法論而得之辨偽成果。《周官》一書歷來迭有疑之者，學者林慶彰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謂宋儒張載、蘇軾、蘇轍、晁說之、胡宏、洪邁、黃震與明儒方孝孺、楊慎、郝敬等，對《周禮》作者皆曾質疑辨難，只不過多爲零箋斷篇，逮及斯大始撰爲專書以辨《周禮》之不可信。該著主要是斯大以《魯史》轉述之《周禮》云云覈之於傳世《周禮》，卻未見其文；又以《周禮》之諸官職掌、法制典章等，取校於《五經》、《論語》、《孟子》等經典所載，發現其中有諸多不合於古禮者；且其弊害叢生，不可用於施政，其用之爲政者，古來僅劉歆與王安石二人，以此他斷論傳世《周禮》非周公所作，「周公之《周禮》已亡；而今之所傳者，後人假托之書也。」<sup>78</sup> 此其名所著爲《周官辨非》的原因。關於萬斯大《周官辨非》的辨偽法，方祖猷〈萬斯大的《周官辨非》〉與林慶彰前揭書皆嘗條陳剖析其細節，如曰「以《周禮》制度有害於民生而辨其非」、「以《周禮》自相謬戾而辨其非」、「〈大宗伯〉所述祭先王之制，與古不合」、「〈司服〉所言天子服制，與古不合」，諸如此類的；不過林慶彰同時也指出萬氏之辨偽法仍有待於商榷者，像是其多引證《孟子》、《禮記·王制》、《尚書·周官》等以證成《周禮》所載各種職官制度之非，但「孟子所述的其他典章制度，也不能作爲當時之實錄來看待。」而有時萬氏也引〈毛詩序〉爲證，然「實不能以〈詩序〉之說來代表詩篇的主旨」，<sup>79</sup> 如此者不一而足。

《周官辨非》之辨非周公所作，主要內容在於斯大認爲傳世《周禮》一書載制有諸多弊害，將害於民生，絕不可以爲法——「《周官》一書所列官冗而斂重，即末世亡國之弊亦無過此者。」<sup>80</sup> 故他認爲周公之書絕不如此，是以復還其名曰《周官》。其辨如：

按：山林川澤，民之所以取材用也，或恐其不時而入，則物或易盡，為之設禁以守之，特數有司之事耳，曷為而官吏若是其多乎？既官吏若是其多，則凡山澤之所出足資國

<sup>76</sup> 梁勇：《萬斯大及其禮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0年），頁26-27。

<sup>77</sup> 《儀禮商·與陳令升書》，頁101-102。

<sup>78</sup> 《周官辨非·前言》，頁1。

<sup>79</sup> 《清初的群經辨偽學》，頁338-352。

<sup>80</sup> 李杲堂：〈周官辨非序〉，《周官辨非》，頁1。

用者，官取之可矣，曷為而賦於民乎？……復物物分歛之，數十百官吏，結網羅、置陷阱於山澤之中，民生其間，真一步不可行，一物無所有，纍然桎梏之人耳。

奈之何征稅以困商？商困而思辟稅，或有不出於關者，即舉其貨罰其人，是不以商視商，而以盜賊視商；以盜賊視商，而已即以盜賊之行待商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sup>81</sup>

蓋儒者持信聖人之治，將以興利除害、利益萬民，「善政莫如薄歛」，<sup>82</sup> 如之何乃以冗官與重賦加諸於民？斯豈周公之制禮作樂乎？斯大不信周公之制如此，以此力辨其非，故曰「官多則糜祿，糜祿則財匱，財匱則聚歛，聚歛則病民。嗚呼！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大學〉生財之道也；作《周官》者，曷亦思之乎？」「然則〈載師〉所言，豈待辨而知為聚歛小人之說乎！」<sup>83</sup> 所以他羅列諸多證據，以論證《周官》乃劉歆用以媚莽，以為施政所本，故為小人舉末世弊政而誣聖人所作者，其絕非周公之定制也。

《周官辨非》一書在《四庫全書》中並無著錄，唯存目而已；《提要》則說明斯大大旨在於病《周官》之「官冗而賦重」，然館臣認為《周禮》之「通儒授受，必有所徵」，雖《周官》一書展轉流傳、不免有所附益，容有可疑、卻不至於偽，故總論以「斯大徒見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又見前代官吏之濫賦歛之苛，在在足以病民，遂意三代必無是事，竟條舉《周禮》而詆斥之。其意未始不善，而懲羹吹蠶，至於非毀古經，其事則終不可訓也。」<sup>84</sup> 故《四庫全書》未加著錄。唯梨洲亟稱許斯大此著，曰「未有得其佐證明顯如兄所言者。」<sup>85</sup> 梁啟超亦謂「《周官》這部書，歷代學者對他懷疑的很不少，著專書攻擊而言言中肯者，實以此書為首。」<sup>86</sup> 所以梁啟超在萬斯大的禮學諸作中，認為《周官辨非》價值最大。

至於《禮記偶箋》——《禮記》自孔穎達《禮記正義》後，以宋衛湜之《禮記集說》號稱大備；唯明胡廣編《五經大全》，其《禮記大全》則獨取陳澧之《禮記集說》，而澧注淺顯、不為儒者所稱，是以明代三禮學荒疏，《禮記》之學尤其衰微，故斯大在清初所撰《禮記偶箋》，便有開端緒之作用，極具清初治此學的先聲意義。但其實萬斯大一生學術所用力最勤者，另在卷帙浩繁的《禮記集解》上（由其子萬經定名），共49卷。據浙東史家全祖望〈禮記輯注序〉，謂斯大之於三禮，於《禮記》成帙最富；又謂斯大方箋疏時，《通志堂經解》未刻，他多方求衛湜書而不可得，於是自付「以吾所見，未必較櫟齋（衛湜）為少，乃自注疏。」至其哀然成編後始得衛書，取而讎之，「則凡櫟齋之所有者，無不在；後乎此者，倍之。」且其「和齊斟酌，審異致同，極之於繭絲牛毛之細，直足過櫟齋而抗文潔（黃震）。」祖望接著又說「是書則以部帙之繁，未有能梓者，予從其家借鈔之。」<sup>87</sup> 不過據斯大之子萬

<sup>81</sup> 分詳《周官辨非·山虞·司關》，頁53、39。

<sup>82</sup> 〈周官辨非序〉，頁1。

<sup>83</sup> 《周官辨非·鄉老·載師》，頁21、25。

<sup>84</sup> 《周官辨非》提要，481。

<sup>85</sup> 黃宗義：〈答萬允宗質疑書〉，頁49。

<sup>86</sup>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72。

<sup>87</sup>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禮記輯注序》（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頁968。

經言，斯大始終未見衛書，全氏所見《輯注》中有衛湜言，係萬經後來所校讎增補，萬經本擬先付刻《經學五書》，嗣後再單獨梓刻是書，未料竟毀於鄰火，全氏鈔本亦佚，故傳世者唯《禮記偶箋》，令人痛心！要之，斯大生於元明經禮不振之後，獨以三禮之學名家，除了《周官辨非》開啓清初考辨《周禮》之風以外，於《儀禮》、《禮記》二學並皆深有闡發之功，誠無愧為「漢學前驅者」，更是清初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禮學家。

斯大之弟斯同則以領修《明史》盛稱於世，但他實際上經、史齊名，著作皆夥；惜其家貧又客死京師，遺稿多散落、或為他人所竊取，致經學之名幾遭湮沒。斯同著作，後世說法不一，經浙江學者方祖猷考證，有33種之多。除史部著作外，其中最負盛名者，為署名徐乾學之《讀禮通考》——該著係因徐乾學遭母喪而請斯同撰作，據全祖望《鮚埼亭集》言「崑山徐侍郎乾學居憂，先生與之語喪禮，侍郎因請先生纂《讀禮通考》一書。上自國卹、以迄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sup>88</sup> 後世亦普遍認同該著為斯同所作，如陳訓慈曰「徐乾學之《讀禮通考》，出季野手筆，為論學者所共知。」<sup>89</sup> 是書所謂「讀禮」乃專指喪禮而言，故其書專論喪期、喪服、喪儀節、葬考、喪具、變禮、喪制、廟制等八事，「喪期歷代異同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其縷析條分，極為詳備，斯同並以餘論撰成《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唯二書並皆亡佚。

不過關於《讀禮通考》之卷數，有九十卷和一百六十卷的不同說法；經方祖猷考證，論曰「季野獨力完成九十卷。徐氏在康熙29年歸里，又請顧炎武、朱彝尊、閻若璩等續補訂定，擴而為一百二十卷、或一百六十卷。」並證之以《四庫提要》言徐氏「歸田後，又加訂定，積十餘年，三易藁而後成。」是以方氏論是書之作者，「以斯同之力為多，然並非全為斯同所作。」<sup>90</sup> 要之，不專主一經、通貫諸經的《讀禮通考》，是言喪禮最詳備的專書，《四庫提要》稱以「古今言喪禮者，蓋莫備於是焉！」<sup>91</sup> 此著為後世論斯同禮學之代表作。

而除了《讀禮通考》外，世疑斯同或另有一部也同樣存在著作者之爭的禮學名著——《五禮通考》。全祖望《鮚埼亭集》說徐乾學在斯同撰《讀禮通考》後，「乃知先生之深於經，侍郎因請先生遍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蔣學鏞《鄞志稿·萬斯同》也說「尚書（徐乾學）又請遍撰五禮，遂節略前書，復補其四，共二百餘卷，未及繕寫，先生卒。稿本留京師一故家，近時有檢得之者，其書多以紙黏綴，或脫落失次，因重為編輯，竟竄名己作，崑山所刻（按：《讀禮通考》），人知出先生手，而《五禮通考》，人或未之知也。」<sup>92</sup> 蓋秦蕙田（1702-1764）《五禮通考》亦成於眾手，可考者譬如戴震，故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說「秦味經（蕙田）的《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這書為續補《讀禮通考》而作；我很疑心有一大部也出萬季野手，但未得確證，不敢斷言。」他並極為斯同抱不平其一生重要著作幾皆為人竊名，《讀禮通考》外，王鴻緒竊名又竄亂《明史稿》乃人盡皆知者，是以梁啟超又嘗語帶

<sup>88</sup> 全祖望：《鮚埼亭集·萬貞文先生傳》，頁353。

<sup>89</sup> 《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清代浙東之史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年），頁611。

<sup>90</sup> 方祖猷：《清初浙東學派論叢·萬斯同著述考略》（臺北：萬卷樓出版社，1996年），頁264。

<sup>91</sup> 《讀禮通考》提要，441。

<sup>92</sup> 轉引方祖猷，頁284。

矯激地說「秦蕙田的《五禮通考》，恐怕多半也是偷季野的。」其下復自註道「據謝山說季野既續作五禮之書二百餘卷，這部書往那裏去了呢？只怕也像《明史稿》一樣被閹人偷去撐門面了。」<sup>93</sup> 學者陳訓慈也說「識者以爲秦氏《通考》，或即大部竄竊萬稿而成。」<sup>94</sup> 唯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反對此說，認爲「無徵不信，厚誣古人。」<sup>95</sup> 是以方祖猷考證萬斯同之遺作，曰「按季野爲徐乾學撰《讀禮通考》，內容僅爲喪禮（凶禮），而未及吉、軍、賓、嘉四禮，其後遍撰其四禮，實有極大可能。斯同卒，其遺書多爲弟子錢名世竊攘，或有散落。然確否爲秦蕙田所檢而竄以己名，則無實據。」是其雖不排除《五禮通考》爲萬斯同撰作的極高可能性，但仍語帶保留地說「真偽難定，或應予以否定。」<sup>96</sup> 並未將之計入斯同著述33之數。

至於《四庫提要》則在《五禮通考》下具名秦蕙田，而曰「是書因徐乾學《讀禮通考》惟詳喪葬一門，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古經散亡，鮮能尋端竟委；乃因徐氏體例網羅眾說，以成一書。」<sup>97</sup> 是其雖未冰釋作者之疑，但卻指出該著在內容和體例上，皆與《讀禮通考》具有續成四禮及因襲體例之密切關聯性。再佐以梨洲文集中有〈答萬季野喪禮雜問〉、〈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等文，並皆可見梨洲與斯同論禮之一斑；而斯同在明史館時，也嘗撰爲《群書辨疑》一書，對於禮制有諸多發揮；復因明代禮制淆亂而撰爲《禘說》八篇，駁斥鄭玄等之謂禘祫二分，認爲禘祫是一祭，「祭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sup>98</sup> 後來斯同並將廟制部分匯編成爲《廟制圖考》，「統會經史，折衷廟制」，凡宗廟之廟制沿革皆圖繪之，附於經後，《四庫全書》著錄在史部「政書類」之「典禮」屬，《提要》稱其「通貫古今，有條有理」，「援徵精確，爲前人所未發矣！」<sup>99</sup> 故有關《五禮通考》作者，姑不妄下斷言，而斯同之深於禮學則確然可知，其於喪、祭之禮尤爲獨具心得。故章太炎〈清儒〉稱曰「自明末有浙東之學，萬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師事餘姚黃宗羲，稱說《禮經》，雜陳漢、宋，……而說禮者羈縻不絕，定海黃式三傳浙東之學，始與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禮書通故》，三代制度大定。唯漸江（今錢塘江）上下諸學說，亦至是完集云。」<sup>100</sup> 皆亟肯定二萬兄弟對於浙東學術深明禮學有傳承之功。

### （三）李光坡（1650-1723）

康熙間猶有一儒李光坡，對於三禮之學亦卓然有成，嘗撰《三禮述注》——《周禮述注》、《儀禮述注》、《禮記述注》之巨帙。李光坡，大學士李光地之弟，然與其兄進身仕途、青雲扶搖相較，則光坡家居不仕、潛心經學，數十年間埋首書冊，孜孜矻矻，澹泊名利；而其家學淵源，其兄李光地《榕村集》中亦有《周官筆記》，其姪鍾倫有《周禮訓纂》，均爲《四

<sup>93</sup>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189、88-89。

<sup>94</sup> 陳訓慈：〈清代浙東之史學〉，頁613。

<sup>95</sup>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清代史家之成就》（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頁305。

<sup>96</sup> 方祖猷：《清初浙東學派論叢》，頁283-284。

<sup>97</sup> 《五禮通考》提要，頁467。

<sup>98</sup> 萬斯同：《群書辨疑·郊禘說》（臺北：廣文書局，1972），卷6，頁13。

<sup>99</sup> 《廟制圖考》提要，頁1667、1668。

<sup>100</sup> 章炳麟：《訖書》重定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頁159。

庫全書》所著錄，其從孫清植則有《儀禮纂錄》，皆與光坡之著作體例相近似，可見其家風一斑。

《三禮述注》主要強調以義貫通，光坡善於疏釋義理，其於《儀禮》，曰「《儀禮》、《周禮》同是周公所制，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又曰「《儀禮》亦名《曲禮》，言儀者，見行事有威儀；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sup>101</sup>於《禮記》，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sup>102</sup>光坡並自述其撰爲《禮記述注》之所由，蓋出於對陳澧《禮記集說》不滿，明初之爲《大全》又一以《集說》爲宗，不合者不取；坡始讀之，「病其未盡，及讀註疏，又疑其未誠。」以其「抵冒前人，即欺負後生，何以示誠乎？」且其內容「逐節不往復其文義，通章不鉤貫其脈絡」，故光坡自謂「本述註疏朱子之教也，陳氏雜合註疏、諸儒爲文，或仍之，或以註疏增其未備、損其枝辭。」<sup>103</sup>因此光坡在求其義通之外，復對於疏注訓詁極爲重視；而乾嘉經學之大成，正是以群經新疏做爲標誌，是故光坡著述亦具承先啓後之功，並皆爲專門漢學之先聲。

《四庫全書》對於《三禮述注》並皆加以著錄，自下列《提要》之於光坡學風述評，一方面可見光坡學術旨趣，另方面亦可照見康熙間學風漸由宋學→漢學，從重視義理逐漸轉向到詁訓強調的轉變之迹。《四庫提要·周禮述注》曰：

其書取注疏之文，刪繁舉要，以溯訓詁之源，又旁采諸家、參以己意，以闡制作之義。……宋儒喜談三代，故講《周禮》者恆多；又鑑於熙寧之新法，故恆牽引末代弊政，支離詁駁，於注疏多所攻擊，議論盛而經義反淆。光坡此書，不及漢學之博奧，亦不至如宋學之蔓衍；平心靜氣，務求理明而詞達，於說經之家，亦可謂適中之道矣！<sup>104</sup>

此論極清楚地表述了四庫館臣對《周禮》的官學立場：既反映出乾嘉漢學重視訓詁注疏；又對清廷持信《周禮》爲周公所作加以申明，以駁斥辨難者之「牽引末代弊政，支離詁駁。」復表明館臣反對學風之「議論盛而經義反淆」，並皆爲官學漸趨漢學的明證。《提要》並說明光坡之學，「雖於鄭、賈名物度數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詞簡要，頗足爲初學之津梁」，即他一方面雖然重在義通，但未如講學家之空言；另方面則他能旁采諸家注疏、以溯訓詁之源，而與清初學風漸趨漢學疏注同趨，因此《提要》說光坡「不及漢學之博奧，亦不至如宋學之蔓衍」，正是居於宋學議論與漢學考證間、可觀風趨之變的有力線索與直接證明。

<sup>101</sup> 李光坡：《儀禮述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冊108，卷1，頁1。

<sup>102</sup> 李光坡：《禮記述注》（《四庫全書》冊127），卷1，頁1。

<sup>103</sup> 李光坡：〈禮記述注序〉，頁2。

<sup>104</sup> 《周禮述注》提要，頁413。

逮及乾隆時期，清廷的官方意識以及四庫館臣的學術立場，已經明顯表現出反對宋學之議論過盛而經義不明了，是以《提要》在《周禮述注》外，復對光坡之《儀禮述注》加以高度評價道「《周禮》猶可談王、談霸；《禮記》猶可言敬、言誠；《儀禮》則全爲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光坡此編雖瑕瑜互見，然疏解簡明，使學者不患於難讀，亦足爲說禮之初津矣！」另外對於《禮記述注》，也同樣站在學風漸變的立場和角度，評價以「其論可謂持是非之公心，埽門戶之私見，雖義取簡明，不及鄭、孔之賅博，至其精要，則亦略備矣！」<sup>105</sup> 要皆可見光坡學風正是學術過渡時期、亦是清廷官學由崇獎理學轉而弘揚漢學的轉變代表。

惟光坡寒素終生，書成而無力刊刻，最後只得借語梅文鼎，聊以自慰地對其子鍾份說「存與不存，不關刻與不刻也。」<sup>106</sup> 幸其遺願得在其子集資付印後獲得實現；三禮館修訂《三禮義疏》時亦曾移文索取所著，《四庫全書》並皆加以錄存其書，差堪獲慰於地下矣！

#### （四）方苞（1668-1749）

方苞早歲究心詞章，中歲以後潛研三禮；他早年曾爲好友戴名世書寫南明史的《南山集》作序——集中因削清號、稱永曆帝號而發生史案，戴名世被殺、方苞初亦論死，賴李光地援救始免死繫獄，獄中方苞專注於禮學，其後出任三禮館副總裁，《三禮義疏》條例依正義、辨正、通論、餘論、存疑、存異、總論等七類，在每節經文之後列敘從漢到明的諸家說解，即據方苞〈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而定。在三禮學上，方苞除了曾經主修《三禮義疏》的《周禮》、《儀禮》等部以外，<sup>107</sup> 他並著有《周官辨》、《周官集注》、《周官析疑》、《儀禮析疑》、《禮記析疑》、《喪禮或問》等禮學諸作，其中多有爲《四庫全書》所錄存者；此外，他還兼治《詩經》、《春秋》，著有《朱子詩義補正》、《春秋通論》、《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錄》等。在一般人固有的對於方苞桐城名家之認識外，實則方苞亦是清代前期經學家、尤其禮學名家，一如《四庫提要·禮記析疑》所言「苞在近時，號爲學者」，其書亦「頗有可採」。

方苞深明三禮之學，尤用力於《周官》一書，他對於《周官》的基本主張，係認爲《周官》內容是周代六官程式，故爲周公所作無疑——他篤信周公之作，曰「《周官》晚出，群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方苞極尊程朱義理，目程朱諸人與聖人同之，並認同程朱的《周官》不僞立場；不過對於《周官》，他認爲是書後來因劉歆助莽而遭竄亂經文，鄭玄作注又未察之，故「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sup>108</sup>

因此方苞撰《周官辨》，即欲辨正劉歆所竄亂以及鄭注之誤者。其曰：

<sup>105</sup> 《儀禮述注》提要、《禮記述注》提要，頁431、454。

<sup>106</sup> 李鍾份：《周禮述注》後跋，轉引自林存陽：《清初三禮學》，頁207。

<sup>107</sup> 論參劉康威《方苞的周禮學研究》（臺北：東吳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頁66。

<sup>108</sup> 〈周官辨序〉，《方望溪全集·集外文》（臺北：河洛出版社，1976年），頁296。

余以〈王莽傳〉辨《周官》所偽亂，循是以考《戴記》、《尚書》及子史傳注，然後知舍莽政之符驗，《周官》無可疵者；舍莽事之比類，古聖無見誣者。循是以討去之，然後諸經之賊蝕，一旦而廓然。<sup>109</sup>

方苞所論《周官》為歆竄亂助莽者，「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故他析辨劉歆造偽成王襁褓之幼、不能蒞阼一事，他另據《尚書·金縢》之言「公為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而論成王「則年非甚少，斷可識矣」，<sup>110</sup> 是以其《禮記析疑》刪此數語。另，〈周官辨偽一〉，方苞所辨如：莽頌六藝而託言《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既篡以後不能遽變十一之說，但他想要增加稅收、又要根據經典，於是劉歆承意竄入〈載師〉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又如王莽立山澤、六筮、榷酒、鑄器稅眾物，以窮工商，於是劉歆竄入〈廩人〉云「廩人掌斂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廩布，而入於泉府。」在市官所掌廩布與罰布外別增其三，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又，莽好妖妄，為天下訕笑，於是劉歆增竄〈方相氏〉、〈壺涿氏〉、〈蜃氏〉、〈庭氏〉等職司「射國中之夭鳥」、「掌覆夭鳥之巢」、「掌除水蟲，……欲殺其神，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沈之」之殊方異俗的職官，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變怪也。……餘例尚多，務使莽行一無悖於《周官》，<sup>111</sup> 若此皆方苞所認為劉歆竄經以助王莽者。此外，《周官》亡〈冬官〉而補以〈考工記〉，然宋儒胡宏等認為〈冬官〉未亡，只是混入〈地官〉；對此，方苞則承李光坡之見，主張〈冬官〉已亡，並反對以〈考工記〉補〈冬官〉，故以《周官》為一編，〈考工記〉另為一編，不冠稱〈冬官〉。《欽定周官義疏》與方苞上論亦皆若合符，蓋以《三禮義疏》之《周禮》即由方苞主修故也。《欽定周官義疏》於乾隆6年完成後上呈高宗，「上留閱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sup>112</sup> 可見所論尚能孚當時共識，不過後儒則評價不一，反對者認為劉歆不能預知莽政，不能預為竄造經文以使莽政符驗。

方苞在主修《欽定周官義疏》外復撰為《周官集注》，亦為《四庫全書》所收錄，是仿朱子之例，《提要》稱其「訓詁簡明，持論醇正，於初學頗為有裨。」並說明「是編集諸家之說詮釋《周禮》，謂其書皆六官程式，非記禮之文」，故「改題本號以復其初。」所論清楚地闡述了方苞認為《周禮》不是記禮之文，故應復其初而稱以《周官》，而《欽定周官義疏》之不稱《周禮》而稱《周官》，即同於此論，四庫館臣也並皆沒有疑義；不過對於方苞所論《周官》之有不合古禮者皆係劉歆所竄入，則四庫館臣頗與三禮館觀點歧異——在清學之「漢學」典範高峰下，以四庫館臣為代表的官方禮學意識，係尊信《周禮》為周公所作、而且反對任何劉歆竄亂或戰國時作的一類說法，因此《提要》緊接著批評方苞另一書《周官辨》，謂其「指《周官》之文為劉歆竄改以媚王莽，證以《漢書》莽傳事蹟，歷指某節某句

<sup>109</sup> 《方望溪全集·書辨正周官戴記尚書後》，頁17。

<sup>110</sup> 詳〈書考定文王世子後〉、〈辨明堂位〉，《方望溪全集》，頁14、15。

<sup>111</sup> 詳《方望溪全集·周官辨一》，頁9。

<sup>112</sup> 沈廷芳，《隱拙齋集·方望溪先生傳》（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冊10，山東：齊魯書社，2001年），卷41，頁2。

爲歆所增，言之鑿鑿如目睹。其筆削者，自以爲學力既深，鑑別真僞，發千古之所未言，……持論太高，頗難依據，轉不及此書之謹嚴矣。」<sup>113</sup> 故據此線索可以溯源乾隆初年開三禮館、到乾隆38年開四庫館期間的思想演變。

《四庫全書》對於方苞所著《三禮析疑》之《儀禮析疑》、《禮記析疑》皆加以錄存，唯獨對於《周官析疑》未予收錄；然三禮之中、方苞實於《周禮》用力最深，且他身爲三禮館副總裁，在纂修《三禮義疏》上具有相當裁斷力，除了主修《周禮》以外，《欽定周官義疏》卷首之〈擬周官總辨〉八條，如曰「以是數者按之莽之亂政，則一一相符，……必歆承莽意而增竄之，非其舊也」，故主張以《周官》「覆按諸職之文，削其爲與莽事相類者，則皆理備而義完，其辭氣亦前後相承無間」，亦皆與方苞《周官析疑》及《周官辨》觀點一致、甚至相同，學者也認爲出於方苞之手。然而儘管關係如此密切、觀點並皆符合，《欽定周官義疏》以其官修而得爲《四庫全書》所收錄；《周官析疑》和《周官辨》卻因「以竄亂歸之劉歆」，<sup>114</sup> 而未被錄存，那麼四庫館臣在彰明官方禮學意識及立場之餘，又如何對此自圓其說？以下以《提要》述評做爲觀察線索。

《提要》對方苞《周官析疑》述論道：

其書體會經文，頗得大義；然於說有難通者，輒指爲後人所竄，因力詆康成之註。……蓋苞徒見王莽、王安石之假藉經義以行私，故鯁鯁然預杜其源。其立意不爲不善，而不知弊在後人之依託，不在聖人之制作。<sup>115</sup>

《提要》對於方苞「於說有難通者，輒指爲後人所竄，因力詆康成之註」，顯然持反對立場；然而對於《欽定周官義疏》之同皆持論「劉歆增竄」，以及王安石依鄭玄之說而襲迹新莽、以至於禍宋，則《提要》申明館臣之立場是毋庸諱言之，其言曰：

大抵《周官》六典，其源確出周公，而流傳既久，不免有所竄亂，不必以爲疑，亦不必以爲諱；說《周官》者以鄭氏爲專門，而訓詁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護其短，亦不可沒其長。<sup>116</sup>

此二述評表面上似有出入，其實相爲表裏；前者說方苞「不知弊在後人之依託，不在聖人之制作」，但這其實正是方苞認爲《周官》是周公所作、但爲劉歆所亂之立論——後儒多謂晚清康有爲撰作《新學僞經考》係受方苞論劉歆竄亂《周官》啓發，唯必須分辨二人古、今文立場不同：方苞持信《周官》乃周公作之，志在維護古經；康有爲則強調劉歆造僞經典，志在否定古經——是故《四庫全書》雖必然地收錄了方苞主修的官修《周官義疏》，卻不得不婉轉地表明館臣係持「不必以爲疑，亦不必以爲諱」、「不可護其短，亦不可沒其長」的態度；反之，《四庫全書》雖未著錄方苞的《周官析疑》和《周官辨》，但《提要》卻也不得

<sup>113</sup> 《周官集注》提要，415。

<sup>114</sup> 《周官辨》提要，頁485。

<sup>115</sup> 《周官析疑》提要，483-485。

<sup>116</sup> 《欽定周官義疏》提要，412。



不代為辯言，辯稱方苞係見王莽、王安石之假藉經義以行私，故「鯁鯁然預杜其源，其立意不為不善。」如此才能既維護清廷之強調古經立場，亦不過貶「竄亂說」以及《周官義疏》緣此而展開的諸多辨偽經文之辨證成果。是以《提要》所論可以視為調停兩可而兼顧雙方立場的說法。

此外，方苞強調三禮互證，他以求其貫通的方法治禮，晚年用力於《儀禮》頗勤，甚至「設為身履其地、即其事，而求昔聖人所以制為此禮、設為此儀之意，雖臥病猶仰而思焉。」<sup>117</sup>《提要》亦謂「苞於三禮之學，《周禮》差深；晚年自謂治《儀禮》十一次，用力良勤。……其用功既深，發明處亦復不少，……皆細心體認，合乎經義，其他稱是者尙夥。檢其全書，要為瑜多於瑕也。」故方苞不惟在修定《三禮義疏》上深具影響力，他也著有禮學各書，《望溪集》中並多論述經傳子史之文，《提要》亦曰「苞於經學研究較深，集中說經之文最多，大抵指事類情，有所闡發。」<sup>118</sup>學者楊向奎並謂方苞「劉歆竄亂《周官》說」開清代今文學之法門，其後劉逢祿遂倡為劉歆造偽《周禮》、《左傳》等古經之說，晚清康有為更張大其說地撰為《新學偽經考》<sup>119</sup>——然則何以後儒在其桐城文士身分之外，卻罕有稱其經生及禮學家身分者？此或由於方苞所持「義理說禮」之進路，頗異於後來清學主流的「漢學解經」進路。方苞究心於宋元經解，素以「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做為立身及學術宗旨，亟推重程朱義理之學，故他強調義理之貫通，並未強調名物辨證，為清代主流外之經學家，《清儒學案》亦稱他「於宋元人經說，薈萃折衷其義理，名物訓詁則略之。」<sup>120</sup>是以方苞經學旨趣與漢學典範之訓詁解經頗為異趣；重以方苞尊朱太過，不容非議程朱，對於凡說與宋儒異者皆加以指摘，至謂「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並舉顏元、李塨、毛奇齡為例，<sup>121</sup>其黨同伐異過激之言，實不足取，故《提要》對於方苞的宋儒學風與臆斷之習，亦多加以批評。如《禮記析疑》提要在稱其「融會舊說，斷以己意」之餘，復加以批評道：

其最不可訓者，莫如別為〈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刪「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終」一段，又刪「不能蒞阼、踐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一段，……夫《禮記》糅雜，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刪定《六經》惟聖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聞奮筆刪削也；朱子改〈大學〉、刊《孝經》，後儒且有異同；王柏、吳澄竄亂古經，則至今為世詬厲矣。苞在近時，號為學者，此書亦頗有可採，惟此一節，則不效宋儒之所長，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sup>122</sup>

論中可見號稱漢學大本營的四庫館之於宋儒改經不滿，以為正是宋學所短；再佐以《提要》之論方苞《春秋通論》，謂「苞乃於二千餘載之後，據文臆斷，知其孰為原書、孰為聖筆，

<sup>117</sup> 蘇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譜》，82歲條，《方望溪全集》附，頁459。

<sup>118</sup> 《望溪集》提要，頁3513。

<sup>119</sup> 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三》（山東：齊魯書社，1994年），頁36-37。

<sup>120</sup> 徐世昌：《清儒學案新編·望溪學案》，頁（臺北：世界書局，1979年），卷51，頁1。

<sup>121</sup> 《方望溪全集·與李剛主書》，頁69。

<sup>122</sup> 《禮記析疑》提要，頁455。

如親見尼山之操觚，此其說未足爲信。」<sup>123</sup> 並皆可見館臣之於方苞輕率改經之不滿，故曰「今錄存其書而附辨其謬於此，爲後來之炯戒焉！」<sup>124</sup> 雖錄存其書，仍不無責賢之意。不過以《提要》相較於漢學營壘江藩論禮之謂「（萬斯大等）吾無取焉！方苞輩，則更不足道矣！」<sup>125</sup> 則《提要》所論尙屬公允。《提要》甚至還稱方苞《春秋》學，「實非俗儒所可及，譬諸前修，其吳澄之流亞歟！」<sup>126</sup> 以方苞比於和許衡並稱南北二學的元儒吳澄，遠出於一般人對方苞的文士認識之外；只不過漢、宋學隔閡，也確是存在乾嘉學界之不改事實。

### （五）江永（1680-1762）

雍、乾之際，徽州江永亦以治禮名；徽歙爲朱熹故里，朱熹晚年嘗亟致力於編纂《儀禮經傳通解》，其用心甚深，即老病之際猶未稍歇，嘗與友人書曰「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著緊處。……急欲了此書，及未盲間讀得一過，粗償平生心願也。」「老拙衰病，日甚於前。目前外事悉已棄置，只此事未了爲念。」「覺得歲月晚，病痛深，恐不了此一事，夢寐爲之不寧也。」<sup>127</sup> 其流風未歇，故皮錫瑞說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爲江永《禮書綱目》、秦蕙田《五禮通考》所自出。」錢穆亦言「徽學原於述朱而爲格物，其精在《三禮》。」<sup>128</sup> 是以清儒江永，其繼起有功者也。

江永，《國朝漢學師承記》稱以「一代通儒」，並認爲戴震爲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之辭。」永長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深於禮；其著作宏富，有《周禮疑義舉要》、《儀禮釋宮增注》、《禮記訓義擇言》、《深衣考誤》、《禮書綱目》、《鄉黨圖考》、《春秋地理考實》、《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推步法解》、《近思錄集注》、《讀書隨筆》、《四書典林》……等。其爲人和易近人，處里黨以孝悌仁讓爲先，嘗勸鄉人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人不知有饑饉。方苞嘗與論禮，從容答之，苞負氣不服，永哂之而已。乾隆崇獎實學，命舉經術之儒，有薦永者，永以「頽然就老，無復可用」辭之，並書弟子戴震曰「馳逐名場非素心。」詔開三禮館，聞永有《禮書綱目》之作，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永沒後，又詔修《音韻述微》，刑部尚書秦蕙田復請於朝，令督臣取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採擇。秦蕙田亦嘗延戴震助修《五禮通考》，戴震於「觀象授時」一類中全篇載入江永的《推步法解》。江藩嘗嘆「竊其唾餘取高第、掇巍科者，數百人；而永以明經終老於家，豈傳所謂『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歟？」<sup>129</sup> 述其禮學於後。

<sup>123</sup> 《春秋通論》提要，頁 603。

<sup>124</sup> 《禮記析疑》提要，頁 455。

<sup>125</sup> 江藩：《國朝經師經義目錄》（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 年），頁 5。

<sup>126</sup> 《春秋通論》提要，頁 603。

<sup>127</sup> 朱熹：〈答黃直卿〉，《朱子文集·續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冊 10，頁 4917。

<sup>128</sup> 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變古時代》（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28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戴東原》，頁 324。

<sup>129</sup> 上據戴震：《東原集·江慎修先生事略狀》（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 年），卷 12，頁 4；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 5，頁 2-3。

江永禮學諸作多為《四庫全書》所收錄，且皆有好評，唯一僅得存目的禮學之作是《儀禮釋例》，因「是書標曰『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此則草創之本耳。」<sup>130</sup> 從另一個角度看，寥寥僅數頁的江永未成之作、草創之本，《四庫全書》猶且加以存目，是館臣對其著作幾可謂之「珍若珎璧」矣！而亦可見擅長考證的江永，確能符合乾嘉學風對於考證精詳之突出要求與強調。在江永禮學著作中最負盛名的，是其《禮書綱目》85卷。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謂江永是書之作，係由於朱子晚年為《儀禮經傳通解》，未成而沒，其後雖經弟子黃氏、楊氏續纂，然猶多闕漏，故江永「為之廣摭博討，一從《周官經·大宗伯》吉、凶、軍、嘉、賓五禮舊次，使三代禮儀之盛，大綱細目井然可觀於今。」<sup>131</sup> 江永亦自言「蓋欲卒朱子晚年惓惓之志，兼備他時採擇。」<sup>132</sup>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係以《儀禮》為經，而以《周官》、《戴記》和諸經史雜書補之；其編類之法，則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江永譽為「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故江永撰為《禮書綱目》，除了續夫朱子未竟之志以外，其特重《儀禮》，亦取義於朱子〈乞修三禮劄子〉之言「《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故江永亦謂「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儀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為諸司職掌、非經曲，正篇又逸其〈冬官〉，蓋周公草創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儒之言，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之義疏耳！」是以三禮之中他特重以儀法度數表現「郁郁乎文」的禮之本經、即《儀禮》是也，且尚為實現考辨禮書理想之所寄。江永自述其《禮書綱目》之體例，曰：

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為凡例以定之，蓋裒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其門凡八：曰嘉禮、曰賓禮、曰凶禮、曰吉禮，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曰通禮、曰曲禮，皆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門居後，總百有六篇，八十有五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焉。……名曰《禮書綱目》，蓋八門為總綱，而八篇則綱中之綱也；篇分章段為目，而事之繁碎者又有細目，則目中之目也。<sup>133</sup>

於是從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到江永《禮書綱要》，「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禮書載籍的儀法度數以及「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者」等，皆得蒐羅備至而釐然有序矣！此也即清儒弘揚禮治理想、欲落實禮學實踐於日常生活之所憑藉也。《四庫提要》論是作「雖仿《儀禮經傳通解》之例，而參考群經，洞悉條理，實多能補所未及，非徒立異同。」並亟稱江永之於朱子《通解》態度持平，因《通解》係朱子未竟之書，故其既「不故相詰難」、「亦未嘗曲相附合也」，其中並有諸多「揆以禮意，較《通解》為有倫次」者，「視胡文炳

<sup>130</sup> 《儀禮釋例》提要，頁493-494。

<sup>131</sup> 戴震：《東原集·江慎修先生事略狀》，卷12，頁1-2。

<sup>132</sup> 江永：《禮書綱目禮書綱目·序》（《四庫全書》冊133），頁4。

<sup>133</sup> 江永：〈禮書綱目序〉，頁2-3。

輩務博，篤信朱子之名，不問其已定之說、未定之說，無不曲爲袒護者，識趣相去遠矣！」故《提要》總論江永是作，「引據諸書，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sup>134</sup> 可謂對之推崇備至。

江永學風尊漢、又尊朱，凡所辨證，皆立足在考證精密的經典基礎上，此不但能夠符合乾嘉學風和館臣的尊漢宗鄭要求，也與清廷的尊朱立場同趨不悖，是以《四庫提要》亟稱美江永之三禮學，如《提要》稱《周禮疑義舉要》：「是書融會鄭注，參以新說，於經義多所闡發，其解〈考工記〉二卷尤爲精，……鄭注亦未及詳解。」清廷立場對於凡涉辨僞《周禮》或駁斥鄭注者，素皆不好，於此館臣謂言鄭注猶有未及者，殊爲難能；《提要》還同時批評孔疏之若干訛誤，「均不及永之所說確鑿有徵」，是以《提要》說江永，「其於古制，亦可謂考之詳矣。」<sup>135</sup> 另外《儀禮釋宮增注》提要，亦曰「是書取朱子《儀禮·釋宮》一篇，爲之詳註，多所發明補正。其稍有出入者僅一二條，而考證精密者居十之九。……其辨訂俱有根據，足證前人之誤，知其非同影響剽掇之學矣。」<sup>136</sup> 《禮記訓義擇言》提要，亦言「是書自〈檀弓〉至〈雜記〉，於注家異同之說，擇其一是，爲之折衷，與陳澧注頗有出入，然持論多爲精核。……全書持義多允，非深於古義者不能也。」<sup>137</sup> 蓋清儒本不喜澧注，每言其淺顯、不如衛湜之《集說》，且謂澧注得爲科舉定式，係緣於朱子、黃榦之故，因此三禮館纂修《禮記義疏》遂退澧注而進衛說，江永亦所不取，《提要》也亟肯定此一立場，於此皆可見清儒在《禮記》學之取向與共識一斑，同時也可以見江永三禮學之「確鑿有徵」、「辨訂俱有根據，足證前人之誤」、「深於古義」，在清代前中期禮學諸家中，確能深孚館臣之心。

除三禮學外，江永在考釋器物方面也著有《深衣考誤》與《鄉黨圖考》。《提要》曰「深衣之制，眾說糾紛。……今以永說，求之訓詁諸書，雖有合有不合，而衷諸經文，其義最當。」「考證精核，勝前人多矣！」<sup>138</sup> 至於《四庫全書》在「四書類」中所著錄之江永《鄉黨圖考》，書取經傳中制度名物之有涉於鄉黨者，分爲九類，計有：圖譜、聖蹟、朝聘、宮室、衣服、飲食、器用、容貌、雜典等，《提要》亦稱其「考核最爲精密。」且謂「其中若深衣、車制及宮室制度，尤爲專門，非諸家之所及。」要之，《提要》對於江永之禮學總評，曰「亦可謂窺於三禮者矣！」<sup>139</sup> 以視夫《提要》之於他書往往有褒有貶，多所批評，則館臣對於江永可謂厚愛甚深，凡所評價皆極推尊其學。

#### 四、從《三禮義疏》到《四庫提要》的官方禮學意識

在清廷「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及文教政策中，乾隆元年到13年開三禮館修定《三禮義疏》、38年到49年開四庫館編輯《四庫全書》，堪稱清盛世中最具代表性的具體政教措施和

<sup>134</sup> 《禮書綱目》提要，頁467。

<sup>135</sup> 《周禮疑義舉要》提要，頁417-419。

<sup>136</sup> 《儀禮釋宮增注》提要，頁437-438。

<sup>137</sup> 《禮記訓義擇言》提要，頁455-457。

<sup>138</sup> 《深衣考誤》提要，頁457。

<sup>139</sup> 《鄉黨圖考》提要，頁755-757。

學術成果。而乾隆即位所諭開的三禮館，以其居間處在康熙崇獎理學和乾隆中葉開四庫館並轉趨「漢學」的過渡歷程中，學風之變趨清楚地反映在三禮館的修書立場上，因此《三禮義疏》一方面表現出若干可與《四庫全書》相互印證、另方面又有若干可以對比四庫館臣轉換價值的禮學意識形態。是故通過考察《三禮義疏》之修定立場，以及《四庫全書》之禮部錄存典籍和《四庫提要》之於採摭對象的存廢去取說明，正可以觀察清廷官方立場的禮學意識形態轉變。故以下結合對《三禮義疏》和《四庫提要》的觀察及比較，以做為考察清初禮學發展及官學意識形態的憑藉線索。

乾隆13年，由鄂爾泰、張廷玉、朱軾、甘汝來等任總裁，楊名時、徐元夢、方苞、王蘭生等任副總裁的三禮館完成了《三禮義疏》之修定，計《欽定周官義疏》48卷、《欽定儀禮義疏》48卷、《欽定禮記義疏》82卷。在《三禮義疏》之修纂上，可以看出清初由惠棟（1697-1758）所樹立的「宗鄭」與「尊經崇漢」等考證學風，已經對於清廷修纂禮學的立場發生顯然的影響與作用了；其後《四庫全書》更是顯持「尊經」之漢學立場，對於凡是涉及疑經、非經者，如辨偽《周禮》、或言《儀禮》非經等，館臣幾皆加以排斥。故《四庫全書》未著錄明儒郝敬的《儀禮節解》和《禮記通解》等，《提要》曰「好為議論，輕詆先儒，此編尤誤信樂史五可疑之說，謂《儀禮》不可為經，尤其乖謬。」<sup>140</sup> 於此顯然流露了清廷反對輕詆先儒、非毀古經之學術立場。再印證前述《提要》之批評萬斯大《周官辨非》，曰「非毀古經，其事則終不可訓也。」復批評毛奇齡《周禮問》，「以為戰國人作，則仍用何休六國陰謀之說，與指為劉歆所作者，亦相去無幾，陽雖翼之，陰實攻之矣；與其以《儀禮》為戰國之書，同一好為異論，不足據也。」並反對方苞《周官辨》之「以竄亂歸之劉歆」，<sup>141</sup> 要皆同持尊經立場而反對動搖經典根本，並皆未加著錄而僅使存目。

其中尤其能夠呈現思想轉變之迹的，是由方苞所主修的《欽定周官義疏》——該著完成後曾經乾隆御覽而一無更定；然逮及《四庫全書》之編定時，則館臣對於方苞持竄亂說的《周官辨》、《周官析疑》，皆未予錄存。再根據《提要》之於《欽定周官義疏》，述曰「大抵《周官》六典，其源確出周公。……說《周官》者以鄭氏為專門。」<sup>142</sup> 清楚地表明了四庫館臣之於《周禮》，係持論作者出於周公、經解則採鄭玄注之學術立場；雖然《提要》也曾對《欽定周官義疏》的若干竄亂辨證提出說明，謂「流傳既久，不免有所竄亂。不必以為疑，亦不必以為諱。」對於駁正鄭注者，也說以「訓詁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護其短，亦不可沒其長。」然而揆諸《四庫全書》之於萬斯大、毛奇齡、方苞各家堪稱代表作的辨偽諸書，皆不錄存，並以為不可為訓，則其尊信古經立場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不過四庫館臣雖然反對清初各家禮學辨偽結果，但對於將《周禮》正名為《周官》的說法，以正唐、宋以來襲自賈公彥《周禮疏》之改《周官》為《周禮》的「實非本名」之誤，館臣則無異議，以其未涉立場也。

<sup>140</sup> 《儀禮節解》提要，頁489。

<sup>141</sup> 《周禮問》提要、《周官辨》提要，482、485。

<sup>142</sup> 《欽定周官義疏》提要，412。

此外清初逐漸形成趨勢的、強調名物訓詁的漢學路數，也反映在修定《儀禮義疏》之立場上。《儀禮》一經自韓愈已苦其難讀，蓋《儀禮》「全爲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故講學家避而不道也。」<sup>143</sup>「《儀禮》至爲難讀，鄭注文字古奧，亦不易解，又全爲名物度數之學，不可以空言騁辯，故宋儒多避之不講，即偶有論述，亦多不傳。」<sup>143</sup>其習者愈少，傳刻之謬便愈甚，故自宋明以來，惟元敖繼公《儀禮集說》能疏通鄭注而糾正其失，號爲善本。因此《欽定儀禮義疏》即以敖繼公《儀禮集說》爲宗，而不取朱熹之《儀禮經傳通解》——從三禮館到四庫館，清儒皆不滿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之「割裂古經」，《提要》說《通解》「所載《儀禮》諸篇咸非舊次，亦頗有所釐析，如〈士冠禮〉三屨本在辭後，乃移入前陳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辭，本總記在後，乃分入前各章之下；末取雜記女子十五許嫁笄之文續經，立女子笄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sup>144</sup>因此三禮館之修定《儀禮義疏》，一從古本而不用割裂改易之說，《四庫提要》亦稱《儀禮義疏》「一一刊其謬謬，拾其疎脫；舉數百年度閣之塵編，搜剔疏爬，使疑義奧詞渙然冰釋，先王舊典可沿溯以得其津涯。考證之功，實較他經爲倍蓰。」<sup>145</sup>故清初所行爲趨勢的，對於職官、制度、儀節等專門考訂之考證學風，皆在《欽定儀禮義疏》中獲得了進一步發展；也揭示了清代《儀禮》學重回名物度數、引經據典之言有實據路上，有力地擺脫了清儒所詬病的、宋儒之空辭敷演義理流弊。

清儒之漢學路數，還可以通過《提要》之於明儒郝敬另一本未被著錄的《禮記通解》述評，清楚地照見館臣之推尊鄭注立場。其曰：

雖朱子掎摭漢儒不遺餘力，而亦不能不取其禮注，蓋他經可推求文句，據理而談；三禮則非有授受淵源，不能臆揣也。敬作此註，於鄭義多所駁難，然得者僅十之一二，失者乃十之八九。……大抵鄭氏之學，其間附會識文以及牽合古義者，誠不能無所出入，而大致則貫穿群籍，所得爲多。魏王肅之學百倍於敬，竭一生之力與鄭氏爲難，至於偽造《家語》以助申己說，然日久論定，迄不能奪康成之席也。<sup>146</sup>

顯然地，四庫館臣反對肆詆鄭注，並舉王肅爲例，謂其竭盡一生之力、甚至不惜造僞以與鄭氏爲難，然終不能奪康成席也。是以凡是批評鄭注太過者，館臣亦皆並無好評、或未加以著錄，如方苞《周官析疑》之見棄，《提要》也明說其「力詆康成之註。」若此並皆可見清廷之官學立場，已自清初康熙崇獎理學而漸次轉向乾隆中葉以後尊經崇漢的漢學典範了。或亦可謂凡被清廷網羅進入四庫館的館臣學者，本即是提倡漢學方法論的同一批學者，是以其學術立場亦遂成爲代表清廷的官方意識。

接著再說到《欽定禮記義疏》：自元儒陳澠《雲莊禮記集說》在明初被定制爲科舉定式以來，誦習相沿而影響廣遠，故明永樂中胡廣奉敕修定《五經大全》，其中之《禮記》即廢鄭注而改用澠注《禮記集說》。有關澠注之大行，《四庫提要》說明南宋朱學大行，澠父大

<sup>143</sup> 《儀禮述注》提要，431；《欽定儀禮義疏》提要，428。

<sup>144</sup> 《儀禮經傳通解》提要，466。

<sup>145</sup> 《欽定儀禮義疏》提要，428。

<sup>146</sup> 《禮記通解》提要，頁500。

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壻，故濬注因朱子之餘蔭而獲獨列學官；然濬注多憑臆說，不知證據，未爲儒者所稱，《四庫提要》評論以「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注簡奧，孔疏典贍，皆不似濬注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濬注之簡便」，故謂濬注「用爲蒙訓則有餘，求以經術則不足。」《提要》甚至還借朱彝尊《經義考》詆以「兔園冊子」爲說，故批評明代《大全》本，「抱殘守匱，執一鄉塾課冊，以錮天下之耳目者。」<sup>147</sup> 至於清朝定制之初仍沿用舊貫，則《提要》亦說明是爲了「以便童蒙」，後來乾隆朝開三禮館重定禮書便不復如是了。

是故三禮館在修定《禮記義疏》上，亟反對濬注之空說義理、未識禮制而沒有根據，濬注「略度數而推義理，疎於考證，舛誤相仍」，<sup>148</sup> 正是清儒所素惡者；故此修禮，清儒首先不宗陳濬《禮記集說》，而「退濬說於諸家之中。」不過其所採摭，也頗有異於《欽定儀禮義疏》、《欽定周官義疏》二書之側重典制考證，此蓋由於《禮記》頗不同於《周官》和《儀禮》之著重禮制，其所側重者在於申明禮意——「禮制非考證不明；禮意則可推求以義理。」故清儒並不反對以義理進路說《禮記》，只是強調必須言有實據，因此《欽定禮記義疏》亦「頗采宋儒以補鄭注所未備。」<sup>149</sup> 至於所採者何？則從三禮館到四庫館，館臣皆亟稱美於宋儒衛湜所撰之《禮記集說》，如《提要》稱衛書：

採摭群言，最為賅博，去取亦最為精審。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所採錄不在此數焉，今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朱彝尊《經義考》採摭最為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sup>150</sup>

《提要》中館臣以著錄繁富的朱彝尊《經義考》和衛湜《集說》相比，發現衛湜還多出49家，極具存古學之功，故譽以「禮家之淵海」，而如此善本卻由於濬注獨列學官、致在若隱若顯間，是以《欽定禮記義疏》取於湜書者特多。對此，《四庫提要》且謂「《欽定禮記義疏》取於湜書者特多，豈非是非之公，久必論定乎！」<sup>151</sup> 直以是非公論歸之衛書，以表彰衛書爲還衛湜以公允評價。

再者，《禮記義疏》除了多採衛注以外，還有值得留意的，即陳濬《禮記集說》承朱學而來，陳濬因〈大學〉、〈中庸〉皆已爲朱子編入《四書》，故遂刪除不載；對此，清儒亟譏以「妄削古經」，因此三禮館此次修禮，遂使〈大學〉、〈中庸〉復歸到《禮記》之中，以存舊本。此亦可謂具體實現了清初陳確《大學辨》之〈大學〉廢經主張——陳確倡論「〈大學〉首章，非聖經也；其傳十章，非賢傳也。」「〈大學〉廢則聖道自明。」「駁歸戴記，

<sup>147</sup> 《雲莊禮記集說》提要，446-447。

<sup>148</sup> 《禮記大全》提要，447。

<sup>149</sup> 《欽定禮記義疏》提要，451。

<sup>150</sup> 《禮記集說》提要，頁445。

<sup>151</sup> 《禮記集說》提要，445。

猶是以〈大學〉還〈大學〉，未失《六經》之一也。」<sup>152</sup> 於此亦可以印證清學已自理學發揚《四書》傳統回歸到尊崇《五經》傳統之路上了。

## 五、結語

禮者何？據《四庫提要》云「禮者，理也。其義至大，其所包者亦至廣，故凡有制而不可越者，皆謂之禮。《周官》所述皆政典，而兼得《周禮》之名，蓋由於此。」<sup>153</sup> 故儒者持信由聖人所「制禮」的禮，其涵蓋面極廣，既包括「禮儀」、也包括蘊乎其內的「禮意」；「禮儀」則又涵蓋國朝典制如明堂、辟雍、禘祀等，以及日用家禮如冠、婚、喪、祭、鄉射、鄉飲酒等；至於禮學，則那就還必須涵蓋書之於文的「禮書」之載籍了。而古禮要能傳世，必須依賴禮書，因為典制儀文等，其器數委曲繁重，不有禮書詳於所載，則進退失其據，是以必須有如《周禮》、《儀禮》、《禮記》等「經禮」之經典載籍，以做為落實實踐的法式指點，因此儒者又必須博古通經，以從事於名物度數等覈實考證的「考禮」工作。但徒有禮制亦不足以自行，是以儒者還必須落實道德實踐，「習禮」以踐行之，此即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之所以側重「學禮」，凌廷堪《禮經釋例》之強調「學禮復性」和「制禮節性」。因此清代禮學復興，實際上涵蓋了內容極為廣泛的「考禮」與「習禮」兩方面為言，而不論從學術變遷、或是清初經世理想的角度來說，清儒所標榜的實學思想都在禮學復興中達到了最高點，「以禮經世」就是清儒所共同寄望於學術發揮經世作用的最有效途徑與指導思想。因此清代禮學思想之突出於學術史的發展特徵，就是回歸經典的禮制考證與實踐強調，並以此與清代強調名物訓詁的考據學風相合轍，而匯流發展出學術成果極其豐碩的禮學大盛及考據高峰。是故在眾所周知的清代考據學之外，不可須臾離的，正是清儒的禮學經世精神；故清儒亟強調經典法式和禮學實踐必須如車轍之雙輪前進，如此始不會落入考證無用的繁瑣鉅釘、亦不會落入空談義理之未識禮制流弊中。

清代是經學興盛的時代，其大成在於清儒展現訓詁成果的群經新疏；不過在由惠棟樹立起「漢學」典範、到戴震繼之以建立系統性訓詁理論、再到後來諸儒撰為群經新疏之出現以前，清代的經學復盛是由群經辨偽開其端緒的。辨偽在清初做為一種方法論運用——余英時謂羅欽順論學所強調的「取證於經書」，就是清初為解決朱、王義理之爭而「以義理的是非取決於經典」之趨向考證契機，故其焦點多集中在各具義理立場的：易圖、改本〈大學〉與古文《尚書》上；但是蠡叢既開以後，則譬如王學系的毛奇齡，便在他用以闢朱的《太極圖說遺議》和《河圖洛書原舛編》之外，復藉辨偽之法以治禮，並且針對姚際恆《周禮通論》（佚）之主張《周禮》是劉歆所偽作，另撰《周禮問》以駁斥之。他認為其書出自戰國，非漢儒所偽作；不過其書雖非周公所作，其制則確然周制無疑。此外，在清初嘗以《易學象數論》闢易圖之偽並開清人辨偽先聲的梨洲，其弟子萬斯大也以辨偽法治禮而著有《周官辨非》，他亦持論《周禮》是戰國人書。因此入清以後，有關《周禮》之考辨問題，遂從漢代學者之

<sup>152</sup> 陳確：《陳確集·大學辨一·辨迹補》（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52、557、563。

<sup>153</sup> 《欽定皇朝禮器圖式》提要，頁1663。



多認為周公所作、亦有何休之疑為戰國所作；到宋儒之頗疑非周公所作、而疑為劉歆偽作，如張載、胡宏、司馬光、蘇軾、洪邁、黃震……等；<sup>154</sup> 再到清儒之於周公所作、戰國所作、劉歆所竄以及劉歆所偽作等，皆各有持論，並且以一種專門辨偽學的高度，以精密的論證將《周禮》考辨推到一個非宋明儒所能企及的考證高峰。

後來清儒復將考辨《周禮》的層面擴大到訓詁章句、典制考證等各方面，考究制度的，如沈彤《周官錄田考》、王鳴盛《周禮軍賦說》；考究製作的，如戴震《考工記圖》、阮元《車制考》；另外還有孫詒讓《周禮正義》之古經新疏等，學者且以為詳審更出於舊疏之上。同時清儒還將考證範疇擴大及於諸禮，譬如萬斯大在《周官辨非》以外，還著有《學禮質疑》、《禮記偶箋》、《儀禮商》等，並皆倡發其於三禮學的見解。此外，段玉裁之《周禮儀禮漢讀考》、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沈彤《儀禮小疏》、胡匡忠《儀禮釋宮》、程瑤田《喪服足徵錄》、任大椿《深衣釋例》、張惠言《儀禮圖》、凌廷堪《禮經釋例》、焦循《群經宮室圖》、胡承珙《儀禮今古文疏義》以及杭世駿《禮記集說》、朱彬《禮記訓纂》、金榜《禮箋》、孔廣森《禮學卮言》、武億《三禮義證》……等，也都可以看出清儒對三禮學的濃厚興趣。

是故清代的禮學成就，從清初到乾嘉、再到晚清，正如為山覆簣而先河後海——從清初諸儒創闢之功，如署名徐乾學、由萬斯同所撰的《讀禮通考》，到乾隆朝修《三禮義疏》、《大清通禮》以及署名秦蕙田而諸儒助修的《五禮通考》，其特徵為博大；再到晚清諸儒發皇而禮學大盛，如胡培翬《儀禮正義》、黃以周《禮書通故》、孫希旦《禮記集解》、孫詒讓《周禮正義》……等，其特徵則為考證精詳而極專精。因此涉及《周禮》、《儀禮》、《禮記》等文獻辨證，涵蓋禮意、禮儀、禮制、禮俗等各層面探討的三禮學，是清代經學復興之中堅，不僅《皇清經解》、《皇清經解續編》所著錄的清儒禮學之作居其大宗，三禮之學和復禮思潮在清代的發展盛況，更綿延不絕有如康莊大衢一般。而本文則主要著力於清初系列禮學家之禮學探討，以學術史的發展脈絡做為考察核心。

<sup>154</sup> 參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頁305-312。